

第17卷 第1期 2024年7月

(本期译自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umber 114 & 115,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主办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 17 卷第 1 期 2024 年 7 月

Vol. 17, No. 1, July, 2024

国际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拓宽领域	1
爱尔兰：走向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	4
从扩张到学术漂移和学生数量下降：荷兰案例	7
美国社区学院：创新者和影响者	10
知识外交：发现、误解和挑战	13
非洲新兴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与多样化	16
美国学术流动中的另一种族问题	19
城市之才：中型欧洲城市日益国际化	21
博士学位有什么用处？	23
重新思考非洲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实施	26
后苏联时期高等教育的三十年改革：成果与教训	29
后苏联地区的掠夺性出版危机	32
台湾的私立高等教育：从繁荣到逆境	35
是什么助长并维持了非洲大学的腐败？	37
精英私立高等教育寂静的全球革命	39
重点建设计划的变革性影响	42
法国的卓越学术：在卓越与平等之间	45
中国大陆地区的重点建设计划	47
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其概念演变的批判性思考	50
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全球化：让我们改变英语教学	53
短期流动的批判性视角：哈萨克斯坦的经验	55
英国大学参与跨国教育的未来	57
“雷达之下”：美国的海外大学	60

吉尔吉斯斯坦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体系：成就与挑战.....	63
亚美尼亚高等教育中“良好实践”的困境.....	65
研究评估：解读指标驱动的压力.....	68
中美科研合作中“关系”的益处与局限.....	71
德国博士学位的数量增长.....	74
传统黑人大学对美国具有重要价值.....	76

高等教育的拓宽领域

德克·范·达姆

德克·范·达姆 (Dirk van Damme)：独立教育顾问，曾担任 OECD 巴黎分部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负责人

电子邮件：dirk@dirkvandammeedu.net

一场革命正在工业化世界悄然进行，这场革命对我们国家和经济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 2020 年，经合组织 (OECD) 国家 25-34 岁人口中拥有高等学历的比例超过了 50% 的临界点。这意味着在高收入国家，超过一半的年轻人现在持有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尽管增长速度可能会减缓，但这一比例将继续增长。

学术漂移

这场革命对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愈发造成挑战，现有的结构是在几十年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设计的。在大多数国家，研究型大学被期望招收不断增长的学生人数，这给资金、基础设施、教职工工作量以及教学和学习实践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尽管面临这些压力，很少有研究型大学公开质疑“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意味着为每个人提供大学教育”的想法。对这种想法质疑被视为与公平和公正相矛盾。

然而，有迫切的迹象表明，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并不仅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毕业生就业不足、过度教育、技能不匹配和替代效应是可以被视为不良影响的示例。即使在工作任务要求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中等技能工作要求应聘者具备硕士学位，这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极化，不断挤压中产阶级，并导致社会不平等水平上升。在一些国

家，政策制定者开始质疑是否真的需要不断增加大学毕业生数量。

技术变革使得发达经济体对技能的要求不再停止于中等教育学历水平。然而，技能需求的变化不是“更多相同”的变化，而是日益多样化的技能组合。高等教育领域将需要进行转型，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

不同的路径

像美国这样具有更多机构多样性的系统可能有更好的筹码来应对这一挑战，但近年来社区大学的招生数量下降表明这并不会自动发生。一些国家，比如 1992 年之后的英国，已经统一了他们的高等教育系统，但面临普遍的学术漂移以及非研究型大学发展前景不明。这些系统坚守着只有一个学术成功典范的思维定式。其他国家，如荷兰或瑞典，拒绝统一他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并保持了二元制体系（另见本期波尔【H.F. de Boer】的文章《荷兰应用科技大学：从扩展到学术漂移及学生人数下降》）。尽管存在各种批评，但二元制体系似乎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至少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多样化。

德国等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在德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参与率相对较低，是接受大学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欧洲国家。许多人将此视为德国教育体系的主要缺陷。然而，

其高度发达的工业基础设施对技术需求有很好的满足，这主要得益于卓越的职业培训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最高的专业学位学历现在已经与学术硕士学位具有等同性。在其他许多国家，专业与职业课程及其学历仍然被视为次等选择，但德国成功地弥补了学术和职业高等教育领域之间的声誉差距。受到德国的启发，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意识到高质量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领域的缺失环节。

扩展学历梯级

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学士/硕士/博士的阶梯成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普遍资格框架。然而，这暗示着整个高等教育领域被高等教育子系统所定义。因此，中学教育资格和最近的高等教育资格（通常是为期四年或三年的学士学位）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所有有高等教育愿望的学生因此被迫进入学士学位课程，结果太多人失败了。高等教育系统试图强制推行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定义，无意中导致了許多社会困难。

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国家在拓展扩大学士学位以下的“短周期”课程，其中包括通常需要 120（欧洲学分互认体系认可的）学分的“副学士学位”。幸运的是，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幸运地预见到了这一发展，该框架包含了 EQF5 级，旨在填补二级教育资格和学士学位之间的鸿沟。然而，声誉不高、雇主的保守态度、提供机构的有限、与学士学位课程的联系过于紧密以及学生需求较低仍然阻碍了这一高等教育领域的突破。

更加具有前景的是学生们对短期课程和非传统证书（如微证书）迅速增加的兴趣。副学士学位证书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

事，但数字徽章和区块链等技术为解决认可和可信度问题创造了机会。在欧洲，在欧洲委员会的支持下，微证书似乎是高等教育领域中一个有前景的新领域。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职业教育领域，正在尝试这些新的证书。

在较长的时期内，高等教育主要关注于拓展学历阶梯的顶端，即博士学位，但现在政治上更多的兴趣集中在扩展学历阶梯的底层部分。这与政治上对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参与、更短的学习轨迹、更高的成功率以及满足高技能之下职业的技能需求，相互符合。

缩短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之间的鸿沟

然而，尽管这些发展前景令人鼓舞，但只有各国愿意应对缩短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间鸿沟的挑战，高等教育领域的转型才会真正发生。继续教育部门主要为 16 岁以上的人群提供以职业为导向的课程，在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拥有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系统）、爱尔兰和英国已经被制度化。在许多其他国家，这些课程以不太制度化的形式存在，标签可能是“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甚至“终身学习”。在学院、培训中心，甚至在教育部门之外的众多提供者，都为年轻或年长学生提供各种类型的课程。

在大多数国家，继续教育或成人教育传统上并不被视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部分。但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英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多项政策，以现代化继续教育并使其更加接近高等教育领域。在爱尔兰，教育部长最近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继续教育、技能和知识的三位一体系统”（参见本期文章《爱尔兰：走向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而在澳大利亚，有强烈的声音主张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整合

成一个一体化的高等教育系统。许多其他国家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发展。

前景展望

高等教育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完成学校教育后，学生需

求的扩大导致了大规模普及高等教育。然而，不仅技能需求在不断变化，学生的需求也多种多样，这要求提供更广泛和多元化的教育回应。挑战似乎在于强化高等教育之外的高等教育系统。

爱尔兰：走向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

艾伦·哈泽尔科恩、汤姆·博兰

艾伦·哈泽尔科恩 (Ellen Hazelkorn)、汤姆·博兰 (Tom Boland)：BH Associates 联合管理
合伙人

网址：www.bhassociates.eu

电子邮件：dirk@dirkvandammeedu.net

对于爱尔兰来说，关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已经带来了社会和经济上的成功，但也导致了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和其他挑战。高等教育被视为个人职业成功的主要途径，而继续教育和培训被视为次等选择。由此产生的应对政策是制定一个统一的三级教育体系，涵盖学习、技能与知识，无论学习者进入继续教育、高等教育或是开启研究生涯，他们都在一个能够满足个人才能、抱负和动机的单一体系中。

关注高等教育成就的国家政策

爱尔兰是迪克·范·达姆 (Dirk van Damme) 在本文中称的高收入国家的典型代表。这类国家超半数的年轻人拥有高等教育学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爱尔兰处于领先地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数据，91% 的学生完成了中等教育，这在高收入国家中属于最高水平之一，约 66% 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了高等教育学习。根据 2022 年的《教育成就专题报告》(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matic Report for 2022)，爱尔兰 25 至 34 岁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高达 63%。在接受高等教育程度方面，爱尔兰在 OECD 国家中排名第三，在欧盟国家中排名第二。

与此相反，据我们估计，只有约 20% 的

中学毕业生参加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爱尔兰 15 至 24 岁人口中未就业、教育或培训 (NEET) 率约为 13.4%，高于欧盟和 OECD 的平均水平。

除了加入欧盟，高等教育参与度的提高也促使了爱尔兰经济的巨大转型。爱尔兰曾经严重依赖保护主义政策和农业，如今拥有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之一，也是欧盟中表现最佳的国家之一。毫无疑问，知识经济范式的采用已经改变了爱尔兰，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爱尔兰社会来说，这些影响也是深远的，从高度保守、自我封闭的社会过渡到一个以更开放、自由民主精神为特征的社会。

过去几十年，最主要的变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简单来说，对于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其目标是让更多人受教育。自 2012 年以来，这一进程得到了《高等教育国家战略 2030》(National Strategy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2030) 的支持，该战略提出了对高等教育格局进行战略引导和重塑，以创建一个更加协调和“连贯”的系统，拥有更多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机构，被称为“有目标的多样性”发展。

但这也导致了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平衡和其他挑战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度关注提高高等教育参与度已进一步弱化了继续教育与培训领域。这已经衍生出一种文化，特别是在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中间，大学教育被视为实现个人和职业成功的唯一途径。这种偏见的看法认为，继续教育与培训是次要选择，主要面向经济弱势群体，这也受到了媒体根据大学入学人数来对中学排名的影响。

同时，国家政策和投入也存在问题。例如，大学校园建设得到了大量基金投入，建造了标志性建筑，而继续教育与培训领域则只能使用简陋的临时建筑和质量低劣的设备。

大学毕业生的经济回报仍然显著。但正如德克·范·达姆（Dirk van Damme）所指出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高等教育的高参与率会产生不当效应。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2019 年，有大约 33.35 万名大学毕业生（占劳动力的 15%）从事着与自身受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2008 至 2019 年期间，在所有创造的新工作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由大学毕业生来填补，但这些毕业生并未能充分利用他们所学的技能。女性更有可能从事与自身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占过度教育人群总数的 56%。过度教育的工作人群主要分布在四个广泛的领域，即：商业、行政与法律，艺术与人文科学，工程、建筑与制造业，以及健康与福利。

劳动力市场两极化也是当前爱尔兰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尽管就业率很高（2023 年 1 月失业率为 4.3%），但在关键领域，如所有健康专业、金融、教师和教育专业人员、公共汽车司机、建筑和工程专业人员等，存在重大技能短缺。人们担忧爱尔兰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正如

范·达姆所指出的，这种两极化的技能结构可能导致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尽管目前尚未转化为显著的社会紧张局势，但这种不平等，加上毕业生未实现的雄心壮志、住房短缺、高租金和生活成本水平的上升，对社会契约构成威胁。

爱尔兰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虽然爱尔兰的人口仍然相对年轻，但它的老龄化速度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这给健康医疗服务带来了压力，但也提出了关于教育和培训体系的问题。像许多国家一样，爱尔兰拥有线性的教育体系，学生从小学进入中学，然后进入高等教育，最后进入工作——但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劳动市场的要求越来越不稳定，这需要一个不同的、更灵活的教育和培训体系。然而，爱尔兰只有 12.6% 的 25-64 岁成年人参加学习，这低于欧盟设立的 15% 的目标。

政策回应

2022 年 5 月，负责继续与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和科学的部长发布了一个名为“推进学习、技能和知识的统一高等教育体系”的政策平台（Policy Platform: Progressing a Unified Tertiary System for Learning, Skills and Knowledge），其战略计划将于 2023 年至 2024 年期间发布。

该计划旨在创建一个新的体系，无论学习者何时进入继续教育、高等教育还是开启研究生涯，他们都可以在一个能够响应个体才华、抱负和动机的单一体系中进行学习。这个体系能够为学习者提供再培训、提高技能并重新设计适合学习者年龄、发展阶段、兴趣与生活状况的资格认定。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所有院校会因其使命、角色和责任更多元化，但这些院校也会在这单一的知识、

技能与创新体系中共同协作。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加强继续教育与培训领域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联系。然而，对于学习途径的关注（例如，使学生可以在继续教育学院开始学习，然后转入大学）只是更加强了大学教育是主要目标的看法。此外，增加成千上万个新的大学入学名额，已导致继续教育领域招生人数的急剧下降。

随着更多关注放在技能培养、开展基于工作的学习（work-based learning）以及进行

更多应用研究上，继续教育学院、技术大学和研究型大学之间对于学生和资源的竞争愈发加剧。在整个系统层面，这激发了有关使命明晰和界限之间的矛盾。

爱尔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高技能（high-skill）经济体，但未来需要制定、资助和实施更加平衡的教育和技能战略。特别需要更加关注加强继续教育与培训，解决技能不平衡问题，以及挑战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

从扩张到学术漂移和学生数量下降：荷兰案例

H·F·德·布尔

H·F·德·布尔 (H.F. de Boer)：荷兰特文特大学 (University of Twente)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研究员

电子邮件：h.f.deboer@utwente.nl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荷兰的高等职业教育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发展历程。在此之前，高等职业教育一直是中等教育的一部分，但在几十年内，该领域发展成为荷兰高等教育的一个完全成熟的组成部分。这种强劲的增长迫使应用科学大学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等类似机构，如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发展成为有韧性、成熟和可管理的组织，并仔细反思其在高等教育中的责任。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学生人数的大幅增加上，还体现在其职责的扩大上。与职责扩大有关，近期学生数量的下降。

荷兰应用科学大学的特点

荷兰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 14 所公立研究型大学 (包括开放大学)、36 所公立应用科学大学、四所公立哲学大学以及一些私立学校。在这个二元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被认为是“平等但不同”，这意味着它们都属于高等教育，但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焦点、历史和文化。需要强调的是，应用科学大学之间也存在诸多多样化。例如，有 10 所应用科学大学拥有超过 2 万名学生，还有 10 所机构拥有不到 1,000 名学生 (主要是艺术和教师培训)。

2021 年，约有 50 万名学生在应用科学大学学习，其中 85% 为全日制学生。每年有超过 10 万名学生入学，其中约 10% 来自国外

(其中 75% 来自欧洲)。与许多其他欧洲高等教育系统不同，荷兰的大学在校生大部分 (60%~65%) 在应用科学大学学习。

20 世纪 80 年代的转折点

20 世纪 80 年代，为如今的应用科学大学奠定了基础。首先，教育部赋予了应用科学大学更多的自主权。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因为直到那时，应用科学大学一直受到紧密控制，特别是与研究型大学相比。其次，应该提到机构合并过程。1983 年，教育部旨在大幅增加应用科学大学的平均规模并减少其数量。因此，应用科学大学的数量从 1983 年的 375 所减少到今天的 36 所。第三，高等职业教育委员会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ncil) 成立于 1975 年，作为应用科学大学的集体倡导者和与教育部的中央联系点。这被证明是改革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确实在该领域的发展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二元体系的可持续性

在过去的 40 年里，高等教育系统的“二元性”一直备受争议。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政府一直捍卫“平等但不同”的立场，并将这一观点写入法律。两个高等教育体系都有自己的法定任务与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教育部希望强调支持多元化高等教育系统

(不同教育机构各自独特的特点) 优点的观点。

然而, 现实并不容易被塞进法律的紧身衣。实际上, 我们目睹到一些应用科学大学发生学术漂移的过程, 而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发生职业漂移, 这意味着两个子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诱使许多人预测, 二元体系瓦解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 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会在短期内发生。

关于应用科学大学的一些问题

与应用科学大学已经承担的广泛责任相关的问题有很多。这些问题涉及到应用科学大学的职能扩展, 学位课程范围的扩大以及入学学生构成的变化。

应用科学大学有三重职能: 教学、实践导向研究, 以及与社会知识交流。研究职能是相对较新的, 反映了荷兰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与研究型大学不同, 直到千禧年之交, 应用科学大学并没有积极的研究职能。2001 年引入了一种新的员工类别, 即有经验的讲师 (lector), 也称为应用科学大学教授, 旨在建立这一研究职能。这类教授的主要任务是与一组同事 (总称 lectorate) 一起进行实践导向研究, 这也意味着应用科学大学将培养“反思性从业者”。这一研究职位自那时以来进一步通过不同方式得以制度化, 例如通过获得国家资金 (通过国家研究理事会)、引入质量控制系统以及建立与专业知识中心的紧密联系。

目前, 在荷兰有近 700 名活跃的此类教授, 相对于员工总数数量较少。但由于此类教授团队不仅包括一个或多个教授, 还包括“教师研究员”和博士生, 参与实践导向研究的员工数量超过 700 名。

尽管在建立研究职能方面已经取得了相

当大的进展, 但应用科学大学仍然主要是教学机构。尽管其在研究方面每年不断增长, 但其研究收入规模相对较小, 仅占有财政资源的 6.3%。相比之下, 2019 年荷兰研究型大学将其 60% 的财政投入用于科学研究。

应用科学大学提供的课程类型在过去十年中大幅增加。在 2003 年引入博洛尼亚进程后 (这是一个在欧洲层面持续进行的过程, 旨在通过在整个欧洲建立相似的学位结构等措施来建立一个欧洲高等教育区域), 应用科学大学原则上只能提供四年制学士学位课程。如今, 它们还提供为期两年的副学士学位课程和为期一到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这些应用科学大学课程是面向职业的, 而不是理论课程。与研究型大学不同, 应用科学大学没有提供博士学位课程 (ius promovendi) 的权利。然而, 它们希望启动自己的博士学位课程: 专业博士 (professional doctorate)。通过这样做, 大学希望扩大职业实践的界限。这将使从学士学位到硕士学位再到博士学位的学习连续体成为可能。专业博士旨在达到与大学博士学位相当的水平, 但性质不同; 国际上对于专业博士的认可情况也不同。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 荷兰高等职业教育的入学人数大幅增长, 从 2000 年的 30 多万人增加到 2020 年的近 50 万人。这给应用科学大学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成长的烦恼), 但最近似乎已经出现了转机。应用科学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相比的市场份额正在减少。几年前, 65% 以上的高等教育学生选择了应用科学大学的课程, 而现在这一比例已经低于 60%。特别是选择应用科学大学的荷兰学生人数在下降 (2021 年较 2020 年下降了 10%), 尽管不是每个地区都同样下降。在一些地区, 这些下降的数字可能会引发严重问题。

应用科学大学学生人数的下降在一定程

度上被国际学生人数的增长所掩盖，尽管远远不及研究型大学。目前，荷兰应用科学大学约有 3.5 万名国际学生，占总应用科学大学学生人数的 7%。

国际影响力

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同类机构一样，荷兰的应用科学大学部门无疑面临着挑战。一方

面，我们看到持续的学术漂移，这表现在研究职能的进一步发展和可能引入第三阶段（专业博士学位）等方面。因此，该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二元性”将继续受到压力。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学生人数的下降。成长和萎缩造成的紧张局势将需要许多应用科学大学重新进行战略定位。

美国社区学院：创新者和影响者

理查德·R·霍珀

理查德·R·霍珀 (Richard R. Hopper)：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越南高等教育改革伙伴关系项目首席负责人、美国缅因州肯纳贝克山谷社区学院 (Kennebec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前校长

电子邮件：rick_hopper@post.harvard.edu

社区学院有时被视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石，而有时则被视为后进者。它们通常不被看作是整个高等教育领域的开创者或变革的先驱，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如此。社区学院的招生数约占全部本科生的 34%，因此应成为对美国整体高等教育进行分析的核心。这近 1100 所机构同时被认为是中等教育的延伸、大学教育前两年的低成本选择，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可信交付机制。如今，这些机构正在积极响应并适应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推动了我们在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中看到的一些重要变革。

实用、非精英部门的起源

到 20 世纪初，最初提供两年制副学士学位的私立初级学院旨在作为年轻女性的结业学校，或者是作为可转入四年制学院的普通转学机会。然而，由于 1944 年的《退伍军人再就业法案》(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又称 G.I.法案)，联邦政府向数千名二战归来的士兵提供了学费报销政策。为了满足需求，公立两年制学院的数量迅速增加，以至于公共部门规模迅速超过了私人部门。因此，美国社区学院作为开放式入口点发展壮大，意味着任何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至今仍然可以）获得入学资格。简而言之，

美国社区学院在没有精英主义障碍的情况下，出色地发展，以满足当地需求。

社区学院还巧妙地将文科与职业和技术教育相结合，这些课程可以使学生获得许多技术专业领域的执照许可 (licensure)。许多人发现较短且通常更职业化的社区学院更适合快速获取就业技能或转学。虽然 80% 的社区学院学生表示希望转学到四年制大学，但这样做的平均只有 30%。社区学院在全面开设成人教育与劳动力发展课程的同时，始终保持对公平与机会的重点关注。美国高等教育也试图以类似的方式发展，努力开放机会之门，并发展基于能力发展的教育。但社区学院已被证明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灵活、适应性最强的部分。

强调短期项目

社区学院的应用性短期学分课程已经取得了显著增长。这始于技术领域的一年制专业证书课程的出现。这种一年的证书通常有资格获得联邦财政援助。随着美国的学位课程报名人数下降，社区学院还提供了更短的非学位（非学分）技术培训和职业发展课程。问题在于：在这些非学位课程中的学生不符合联邦财政援助的资格。微证书（即通过短期非学位课程对技术能力进行编码和认可）的出现，导致了“徽章”实践，即能够展示

所学技术能力的参与者将获得一个证书或“徽章”，以纪念他们获得特定技能和知识。大学正在慢慢开始关注微证书，但没有社区学院领域那么积极。

由于这些培训计划不符合美国联邦财政援助（US Title IV federal financial aid）的条件，这些计划完全以成本回收为基础，参与者、州政府和地方产业通常分担成本。目前在联邦层面已经有讨论，如何扩大学生财政援助的范围，包括报销非学位职业培训计划的费用。这种扩大的学生补贴机会将是一场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使非学位和职业技能认证摆脱阴影，显著地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有一些有远见的慈善家认识到了非学分职业培训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如果用于职业培训的慈善捐赠增长，它可能可以比政府更快地改变美国的人力发展格局，改善几代人的生活机会和生计。

对社区的重要性

尽管排名最近被指责为操纵高等教育体系的手段，但有一份排名确实非常有帮助，那就是由阿斯彭研究所发布的美国社区学院前 120 的排名（Aspen Institute ranking of the top 120 US community colleges）。这份排名最受欢迎，因为它侧重于可验证的数据，关注公平性、入学、学位课程学生的保留率、学位完成率以及转入四年制学院等问题。一些针对四年制大学的排名使用更为主管的竞争力指标，与此不同的是，社区学院排名不涉及模糊的入学标准、考试成绩、研究生产力和其他主观的对大学声望的评价因素。社区学院的地方特质意味着很少有学生会选择远离家乡的学院，因此阿斯彭研究所发布的这个排名的有用之处，在于通过展示院校在公平性使命中取得的卓越成就来对社区学院

进行评价。

社区学院把公平性放在核心位置，同时也加倍努力消除在入学机会、可负担性、学生保留、种族多样性和学位完成等方面所存在的障碍。由于学校将干预重点从对准备不足的学生进行补习教育转向采用并行学生支持的发展教育（developmental education）转移，因此人们开始对学生是否对大学学习做好准备产生担忧。这种措施的目的是确保学生从他们开始学术轨迹的那刻就朝着取得学位的方向取得进展，从而缩短完成时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种转向并修课程（corequisite）的发展教育更为有效。由于四年制大学正在与社区学院竞争招生，它们也在尝试有效的发展教育来增加入学率；然而，这些做法往往会削弱珍贵的精英主义外表。

同时，社区学院正在审视其自身的管理体系，以识别数量庞大且复杂的繁琐政策和做法；目标是找到机构运营可能妨碍学生入学和进展的方式。这要求机构对入学、注册和学位要求进行坦诚的内部评估，以便他们可以明确和简化路径，引导学生实现他们的学术目标，而不受官僚主义绊脚石、费解的“要求”和迂回的学位完成路线的干扰。

随着美国的入学人数下降，学院正在寻找扭转趋势的创意方法。直接让高中生参与大学水平的课程，不仅作为一种招生工具日益受到青睐，还成为有意向的学生省时省钱完成学位的途径。面向高中生的双学籍和同时入学计划不断增多；这些计划通常被标记为“早期大学”或“桥梁”计划。如今，许多社区学院的学生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学生同时注册高中和社区学院课程，从而掩盖了传统入学人数的大幅下降。在一些州，双重学籍对高中生是免费的，基本上是一项没有资金支持（高成本的）活动。其他州会为双

重学籍的学生提供学费和费用补偿，从而有助于支持大学的预算。同样担心入学人数的州立和私立大学现在也努力通过推出和推广自己的早期大学计划来与社区学院竞争。

美国社区学院已经发展成为敢于创新、

灵活和受当地尊敬的组织。他们近期的创新做法确保了继续推进教育公平性，并为美国各地多元社区的重要劳动力发展目标提供支持。

知识外交：发现、误解和挑战

简·奈特

简·奈特 (Jane Knight)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兼职教授

电子邮件: jane.knight@utoronto.ca

毫无疑问, 国际高等教育的格局正在变化, 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这两个领域的交汇点却鲜有人研究。对于国际高等教育在构建国与国之间关系、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作用进行全面的跨学科综述后, 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发现、误解和挑战。

术语混乱

在这两个领域中, 有超过十种术语被用来描述国际高等教育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 这些术语有时会混淆。它们包括软实力 (soft power)、文化关系 (cultural relations), 以及许多不同类型的外交, 如科学外交、公共外交、教育外交、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等。许多这些术语非常具体, 无法完全反映当代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广度, 也未能充分考虑到非国家行为者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大学、研究中心和智库。例如, 在国际关系中最常提到的国际高等教育活动是传统的学生流动、奖学金和双边机构的活动和协议, 而忽视了最近的发展, 如知识城市 and 中心、卓越中心、国际研究网络、国际联合大学、教育与产业合作伙伴关系等。通过对国际高等教育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全面回顾, 我们发现, 学术界未能充分认识到研究和创新在国际高等教育在国际关系

中的作用, 除了在科学外交的概念中提到, 而且这一提及主要集中在科学和技术领域。

知识外交

因此, 我们有意将国际高等教育的术语扩展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简称 IHERI), 以承认“研究”和“创新”在强化国际关系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重要性。这引出了“知识外交”这一术语, 以更好地捕捉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在国际关系中的广度和重要性。我们将知识外交定义为“通过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来增强国家之间和国际之间的关系的过 程”, 这一定义故意设计得通用, 可以适用于多种地缘政治情境、问题和领域。这个定义不包括在其他描述中有意使用的理由、活动和价值观, 如“知识外交涉及到多样化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 参与协作的教育、研究和创新项目, 这些项目以相互利益和互惠互利为基础, 旨在构建和加强国家之间和国际之间的关系, 以增进相互理解并应对全球问题”。

关于知识外交和软实力的误解

对软实力与外交意图、价值观和结果的误解, 尤其是由高等教育部门引起的, 需要得到理清。软实力一词基本上被理解为在国

际关系中利用说服和吸引力来实现自身利益，通过融合或彼此不断争取竞争优势。

各国在软实力的战略中利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但不应将其描绘成建立信任和相互理解的手段，许多国际高等教育领导人、研究人员和决策者都相信并推崇这一点。虽然在软实力和知识外交的方法中，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的执行者和活动可能是相同的，但其价值观、运作方式和结果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而言，外交以及特别是知识外交是关于寻找共同点、合作、协商冲突、确保合作伙伴获得相互但不同的利益，同时仍然致力于满足国家自身利益。这与软实力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两种方法都有在通过发展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从而倡导国际外交，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动机、价值观、策略和结果。

知识外交是否与文化、科学和公共外交相同？

在利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从而发展软实力与知识外交的两个途径来看，区别是明显的，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在知识外交和相关的外交，如文化外交、科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更加微妙。

文化外交主要面向各领域的国际交流和活动，包括艺术、教育、体育和其他文化表达形式。文化外交的目标是增进国际间的跨文化认知、信任和关系。当将国际高等教育称为文化外交时，最常提到的活动包括学生/学者交流、语言学习、联合会议和文化活动。虽然文化外交包括广泛的人际教育和文化交流，但它不足以包括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的核心元素，如研究与创新。

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科学外交和知识外交是否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值得考虑，

取决于如何广泛地定义科学。如果科学被广泛解释为拉丁语 *scientia* 中的知识，那么它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传统上，科学外交一直被视为自然科学，最近则被置于科学和技术框架内。毫无疑问，这反映了科学和技术在今天的知识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安全等众多全球挑战中的重要性。然而，人们必须问的是，是否专注于科学和技术会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其他领域和问题。例如，科学外交倡议或谈判是否会包括社会或人道主义问题，如移民、老龄化、难民、性别、社会公正、包容、贫困或人权倡议。因此，虽然充分承认了科学（和技术）外交的重要作用和作用，但这并不排除知识外交的必要性，后者更广泛地涵盖了知识在各种全球问题中的生产和应用。

公共外交被描述为一个国家为推进政策和行动而努力与其他社会的公众建立和维护关系。它常常与声誉建设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涉及广泛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可以应用于同样广泛的问题领域。毫无疑问，公共外交可以包括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相关的行为者、问题和活动，但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而“知识外交”这个术语更专注于特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及其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相关的活动。

当前挑战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知识是应对国家、地区和全球问题多样性的关键资源。但是，它伴随着许多挑战。知识安全，即保护免受不良传输和使用敏感知识和技术的风险，包括国际间谍活动，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风险。另一个关切是知识的政治化，即各种行为者，包括政治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将知识塑造

成符合自身利益的形象。知识的民主化，即扩大和尊重不同类型和知识生产者的知识，是全球北方和南方国家都面临的另一个挑战。还需密切关注知识外交被视为“社会洗白”，即在对问题的承诺和真实行动与互惠之间存在脱节的情况。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面临更具竞争性、民族主义和动荡性的现实，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然而，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可以忽视将知识外交方法应用于国际高

等教育、研究与创新，以促进解决国家、地区和全球问题，并加强国家之间和国际之间关系的潜力。

注：本文基于作者的著作《国际关系与高等教育中的知识外交》(*Knowledge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由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 (Springer Nature) 于 2022 年出版。

非洲新兴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与多样化

帕特里西奥·V·兰加

帕特里西奥·V·兰加 (Patricio V. Langa)：南非西开普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莫桑比克埃杜阿多·蒙德拉内大学 (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 社会学和高等教育学教授，德国波恩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onn) 杰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研究员

电子邮件: planga@uwc.ac.za

除了南非和一些北非国家，大多数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新获独立的非洲国家继承了来自前殖民主义国家的单一国立高等教育机构或仅有几所高等教育机构。在独立后的六十年中，尽管速度不同，但高等教育系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特别是新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

政府主导的差异化与多样化

在行使新获得的政治主权时，非洲政府是增加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的主要推动力，这是基于扩大教育机会和参与的政策。由于资源有限，这种教育扩招是谨慎进行的。

这些扩招政策设想高等教育在通过培训人力来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主要是为了操作国家机构并通过快速的工业革命引导经济发展，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从独立时的单一层面/单一机构，许多高等教育系统逐渐演变成容纳各种不同高等教育机构的组合，其课程项目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通常是有限的）多样化。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之间，非洲国家政府在维护国立大学和建立一些新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满足国家发展进程。尽管目标并不总是明确的，但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国家政策影响了可以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种类，包括结构、治理机

构、研究项目和学位类型。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可以被认为是非洲政治上主权的第一个时期，这些差异化和多样化的政策都遵循了新独立非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议程。

在某些情况下，大规模的学术人员外流几乎导致了国立（单一）高等教育机构的关闭。因此，尽管需要扩大教育机会和参与，但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不是一个选择。仅仅几十年后，随着高中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并且政府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时，扩大入学机会的压力才与差异化和多样化高等教育的需求相结合。

财政危机和短暂的政策主权

20 世纪 70 年代的财政困境，是由西方石油短缺和价格上涨导致的，阻碍了重大扩张，几乎导致了单一（或极少数）国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关闭，因为国家预算出现严重赤字。20 世纪 80 年代，非洲国家开始与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协商加入纠正性财政计划，不仅是为了拯救他们崩溃的经济，还为了防止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关闭。

随着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和多样化政策必须受到世界银行规定的财政纪律措施的制约，非洲高等教育治理的政治主权是短暂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世界银行实质上“发号施令”，基于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指导非洲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和多样化的主要政策利益相关者。私有化，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化和商业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是高等教育商品化的过程，这引发了一些不满。

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高等教育一方面是一种奢侈的私人产品，产生的社会回报率太低，难以证明其公共投资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它对直接受益者产生相对较高的回报，从而证明了成本分担的合理性。换句话说，用公共资金资助公立机构中的私人学生等同于用公共资金资助精英阶层。面对校长威胁要关闭公立大学的强烈反对，世界银行采取了政策来重组高等教育，使其朝着更加以市场驱动供求逻辑的方向发展。

寻求政策原则

进入后殖民时代，非洲高等教育经历了 60 年发展，可以合理地问：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和多样化走向何方？有大量证据表明，非洲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呈现不断扩张、差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这一变化表现在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不断涌现，以响应各种国家战略，提供不同类型的技能和知识，面向各种兴趣和能力的学生。

尽管如此，但在非洲高等教育机构中，缺乏有力的国家、地区，甚至全球政策来指导内部和外部、机构和系统功能的分化过程。主导趋势是基于品牌策略和名义区分（基于命名），而不是基于功能区分（即在一个协调和整合的系统内执行不同功能的高等教育机构）。

当前的发展预示着多种力量正在引入和推动非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差异化和多样化。

这些力量隐性或明确地引导差异化和多样化，以扩大各种类型的学生可选择的范围，提高教育提供的效率，并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上需求较高的技能和能力的集合。

总之，以下是一些推动差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政策以获得更全面的列表）。首先，国际排名正在推动一些非洲高等教育机构寻找方法，以区别于以教学为基础和教学为导向的主导趋势，找到独特的定位与特色。尽管在方法上存在一些缺陷，但排名是分化的推动因素。

此外，追求研究密集型地位和特色，以及全球关于研究卓越计划的讨论，也通过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的具体计划和行动推动了差异化和多样化，例如由非洲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协调的由世界银行资助的卓越中心，以及德国学术交流服务（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简称 DAAD）的非洲未来卓越中心计划（Centres of Excellence for Africa's Future Program）。这些中心，特别是公共非洲旗舰国立大学，都在寻找研究领域，以区别于以教学为主导和以利润为驱动的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机构。非洲研究大学联盟（Af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lliance）的成立证明了这一趋势。

对学生的竞争也推动了名义上的（而非功能性的）差异化，私立高校加强了它们的市场营销和品牌策略，包括通过强调（不总是准确的）自己的卓越。最后，尽管尚未成熟，但国际化，即在非英语国家引入英语作为一些课程和项目的教学媒介，以吸引国际学生和融资，是影响项目多样化的另一个明显趋势。最后，国家政治也是差异化和多样化的推动力。政治家们承诺将高等教育带到他们的社区，这通常导致新机构的建立，然

而这与协调、整合和系统范围内的公平可持续高等教育提供相去甚远。

美国学术流动中的另一种族问题

赫拉尔多·布兰科

赫拉尔多·布兰科 (Gerardo Blanco)：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学术主任

电子邮件：blancoge@bc.edu

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存在多个种族问题，就像《国际高等教育》杂志在 2020 年专栏中提到的那样。其中一些问题包括教育留学项目中明显的种族参与差距以及一些反复出现的敌对政治言论，有时甚至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自从新冠疫情以来，出现了针对中国和其他国际学生的反亚裔种族主义，这成为另一个挑战。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美国作为一个留学目的地仍然具有吸引力，就如 2022 年《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2022) 所展示，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数量已开始恢复。然而，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仍然过于依赖入境流动，而且经济因素考量通常左右着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兴趣。作为留学目的地，美国以及美国大学受益于其坚强且具有韧性的品牌。富布莱特计划 (Fulbright Program) 是与美国学术流动密切相关的最具知名度的品牌之一。

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尊崇

阿肯色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文理学院以威廉·富布莱特 (J. William Fulbright) 的名字命名，他是该州历史上最杰出的阿肯色人之一，他的雕像在校园内显著展示，他还曾担任该校的校长。2020 年，该大学的一群黑人学生要求从文理学院的名字中删除他的名字，以及拆除他的雕像，他们

的理由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反对在美国学校和公共场所推进非洲裔美国人融合。这些学生的抗议活动让人联想到要求英国牛津大学和非洲其他大学取消对殖民统治者塞西尔·罗兹 (Cecil Rhodes) 的纪念运动。罗德奖学金 (Rhodes Scholarship) 是学术流动中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威廉·富布莱特曾是一名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他还是阿肯色州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罗德奖学金的人，据说这一经历激发了他在美国创建学术流动计划的灵感。

在阿肯色大学，一个委员会就如何处理富布莱特的遗产进行了讨论，并建议将他的名字和雕像删除。然而，大学董事会决定保留这两者，理由是州法律禁止从公共场所移除纪念碑。

与阿肯色大学学生引领的公开辩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的国际教育界似乎鲜有人注意到学生的抗议活动以及该大学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国际教育专业组织之间没有公开讨论，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纪念富布莱特项目 75 周年的网站已删除了所有与威廉·富布莱特有关的引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网站承认“他在民权方面的投票记录激化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和不平等。”尽管这个说法是准确的，但它并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行动建议。

并非仅是“觉醒”问题

在《国际高等教育》第 110 期中，斯多克尔（Carel Stolker）讨论了学术界的“觉醒”现象以及反对所谓的“取消文化”。关于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重要的是不要将基于历史证据的批判性分析与“取消文化”混为一谈。诚实和透明地探讨富布莱特的遗产并不等于试图取消他。相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面对不仅仅是他的“混合遗产”，还有国际教育专业领域的价值观，以及当代与种族不公现象可能相关的问题。简而言之，分析富布莱特的遗产更多地关乎我们专业领域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关于他个人的问题。

富布莱特计划的官方品牌和形象指南侧重于“建立持久联系，创造更和平的世界”，并将其作为该计划的核心品牌理念，但它没有提及富布莱特或他具有争议的遗产。与此同时，在纪念该计划 75 周年的网站上，富布莱特的形象已不再显眼，取而代之的是突出了像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而他不是富布莱特计划的获奖者）以及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等杰出的黑人人物，后者是英国第一位非白人政府首脑，这似乎是试图掩盖或粉饰一个复杂的现实，这值得我们去进行批判性分析，或深入反思。最近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富布莱特计划当前的品牌状态已经从富布莱特转向了富布莱特计划的获奖者。当然，尊重多元化的富布莱特计划获奖者，他们的遗产不应因该计划创始人的个人缺陷而受到损害，这是适宜的。然而，在这一过渡时，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承认不仅仅

是富布莱特的个人遗产，还有该计划的早期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地区。

前进之路

本文并不是呼吁从美国的旗舰学术交流计划中删除富布莱特的名字。这样做可能会掩盖富布莱特用他的参议员职位维护种族不正义的行为。考虑到即使在国际教育工作者和富布莱特获奖者中，了解富布莱特的种族隔离背景的人们也感到惊讶，那么，符合学术价值观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富布莱特的世界观，其中也包括了他在美国在与世界互动时的傲慢。

一个好的起点是，国际化的学者和从业者，以及国际教育的学术和专业协会，应该学习并传播由委员会收集的关于是否删除阿肯色大学的富布莱特名字和雕像的证据和分析。同样重要的是，应该就学生运动进行讨论，如“罗德必倒运动”（#RhodesMustFall）以及大学去殖民化问题的讨论。一个务实的做法是反思在高等教育中常见的、以个人名字命名项目或建筑物的风险。最后，尽管富布莱特计划的历史发展中存在一些阴暗面，但该计划拥有多元化的校友网络，这些校友已经组成了类似面向黑人学者或拉丁裔学者等的非正式团体（如 Fulbright Noir 和 Fulbright Latinx）。支持这些团体并弥合现有的种族参与差距应成为该学术交流计划的工作重点。

城市之才：中型欧洲城市日益国际化

威廉·范·温登、玛丽安·库尼汉

威廉·范·温登 (Willem van Winden)：荷兰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城市经济创新学教授

电子邮件：w.van.winden@hva.nl

玛丽安·库尼汉 (Marian Counihan)：城市和移民研究哲学家、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讲师

电子邮件：m.e.counihan@rug.nl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中型城市已成为吸引技术移民的活跃地点。大学一直是主要的推动力，吸引了来自欧盟和非欧盟国家的国际学生，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国际学生需求。此外，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导致这些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专业人士（外籍人员、独立工作者）。大学和城市政策制定者已经将技术国际化视为一种增加收入、提高多样性和国际都市化（“我们不是一个小城市”）的方式，或者作为应对因人口老龄化而导致本土市场萎缩趋势的方式。

本文探讨了国际化浪潮在欧洲中型城市中的发展情况，在我们的分析中也结合了来自多个欧洲城市的政策观点和良好实践。

技术移民涌入中型城市

技术移民过程在不同类型的城市中表现出不同特点。拥有高排名大学的城市，如海德堡、鲁汶、隆德或牛津，已经围绕其大学发展了国际化的知识型经济，包括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和以科学为基础的企业。它们吸引了不仅仅是国际学生，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国外的科学家和知识工作者。相比之下，中欧的城市，如德布勒森或蒂米什瓦拉，已经吸

引了来自欧洲和亚洲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他们吸引的是中高技能的工程师，用于建设和运营工厂，而不是大量的国际学生。

每个中型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因素组合，并产生了独特的技术移民情况，但它们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挑战。与首都或国际枢纽城市相比，中型城市没有庞大的国际劳动力市场，这使得技术移民（以及他们的伴侣）更难规划职业生涯，导致了较低的留存率。这些城市也缺乏多样性的移民与外籍人员组织，这些组织可以有助于移民更好融入当地生活。此外，与有长期移民历史的大城市相比，这些小城市的宿主社会往往不太愿意接纳移民。

城市及其利益相关者如何对待技术移民

五个关键主题详细阐述了技术移民及相关政策的特定方面。

- 城市品牌：城市和大学往往将自己定位为具有吸引力、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地方，以吸引国际人才，遵循争夺最佳智力的逻辑。但这些闪亮的营销活动并不总是与学生和居

民的日常经验相符。城市如何有效地打造自己的品牌？利益相关者如何有效合作？

● 社会文化融合：技术移民以不同的原因大量涌入中型城市。但他们到达后，他们如何融入当地社区（如果融入的话），他们面临什么障碍，会出现什么冲突，城市制定了什么政策来促进融合，避免并行社会的出现？

● 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大多数中型城市中，大学是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大学一直以来都具有国际化的特点，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们所吸引的国际（交流和学位求学）学生和工作人员数量激增，并发展了课程国际化。是什么推动了这一趋势，利益相关者如何合作？

● 劳动力市场融合：国际学生和其他技术移民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伴随着一些挑战，尤其是在中型城市中，它们没有长期的技术移民历史。国际学生的留存率往往较低。许多中小型企业难以适应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劳动力。职业轨迹也不总是按计划进行；技能退化现象也普遍存在。此外，在（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正在改变工作实践，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 城市治理：城市利益相关者面临如何协调行动，以吸引和/或纳入城市中的国际技术移民，解决上述挑战的问题。在我们的书籍《城市之才：中型欧洲城市国际化的良好实践》中，鉴于欧洲城市的实践，确定了各种“协调的国际人才管理”模式。

关于国际高等教育的一些关键发现

首先，在大多数城市中，吸引国际学生和其他技术移民的政策缺乏实证支持，未能明确定义具体的目标群体或追踪外籍人士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在线社区包含了丰富的

第一手质性信息，比如关于技术移民的感受，他们对城市的评价，以及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城市和大学管理部门迟迟未能利用这些丰富的质性数据来制定政策，或积极与学生和其他技术移民就这些问题进行互动。有效的人才管理是必须的，其中应包括收集关于城市和地区技术移民福祉的情报。

其次，国际化不仅仅是为国际学生和其他技术移民提供日常生活的便利。它意味着城市整体定位的转变，包括地方机构、组织和居民。它将产生广泛的影响，需要积极管理。这适用于地方组织，它们需要为更广泛的居民提供服务的能力。一些城市，如格罗宁根或鲁汶，采取了更具战略性和协作性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稳定和长期的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而不仅仅是零星的项目。此外，各个城市应明智地选择共同发展一种关于国际化的综合愿景，超越移民，不仅考虑本地层面，还考虑地区、国家和跨国层面。

最后，高等教育中的国际化可以有助于将城市和大学围绕重大社会挑战汇聚在一起。一些欧洲大学联盟正在引领发展，制定了计划，让学生与不同城市环境中的城市利益相关者共同解决社会挑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交流体验，也为城市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注：本文基于库尼汉（M. Counihan）与温登（W. van Winden）编辑的《城市之才：中型欧洲城市国际化的良好实践》（*Cities For Talent: Good Practices For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Medium-Sized European Cities*）一书，由格罗宁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可在此处下载：<https://books.ugp.rug.nl/index.php/ugp/catalog/book/94>.

博士学位有什么用处？

克劳迪亚·S·萨里科

克劳迪亚·S·萨里科 (Cláudia S. Sarrico)：葡萄牙明奥大学 (University of Minho) 经济与管理学院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管理学教授、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成员

电子邮件：c.s.sarrico@eeg.uminho.pt

在高收入国家，博士学位的获得率迅速增长，最近低收入国家也呈现出类似趋势。2019 年，OECD 地区 25-64 岁人口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平均比例约为 1%。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当今的年轻人中将有 2.3% 会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攻读博士学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扩张，以及现今的博士学位有什么用处？

博士学位人数增长迅速

对博士学位持有者数量的担忧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美国，但这种担忧并没有抑制增长。持续的扩张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博士学位对个人和社会的投资回报是什么？

博士学位的规模扩张是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追求的一般性扩张的结果，这一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马丁·特劳 (Martin Trow) 已有讨论，同时高参与率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在全球普及。

博士教育的规模扩张旨在培养人们进行研究，这是 OECD 国家的一个早已确立的现象，研究活动传统上集中在这些国家，但如今研究能力正在扩展到更多国家，中国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信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 年，只有 36 个

国家的博士学位获得率超过了人口的 0.6%，其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不属于 OECD。在 OECD 地区，1997~2017 年的 20 年间，新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从 14 万到 27.68 万）。相比之下，2000~2020 年期间研发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只增长了 18%。这意味着许多博士学位持有者将不参与研究活动。

博士学位获得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普通高等教育获得的增长速度：在 2014~2019 年间，OECD 地区的博士生教育增长了 25%（从 0.93% 到 1.16%），而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为 12.7%（从 33.65% 到 37.90%）。

为什么颁发了这么多博士学位？

政府一直鼓励培养更多的博士生，希望发展知识经济以促进增长和繁荣。研究资金直接奖励高等教育院校培养更多的博士生、并发展更多的博士后职位，也间接鼓励了研究出版与引用。大部分额外的研究资金用于固定期限项目，这些项目雇佣博士后研究员，签订固定期限合同。博士生教育的扩张确保了这些博士后职位的不断供应。

研究资金的增加也激发了大学毕业生对学术职业的需求，尤其是那些“热爱科学”的毕业生。在某些领域，这些博士学位持有者在学术界外也备受重视，因为雇主们欣赏

他们的技术和可转移技能。这种情况在科技生态系统中更为常见，在这些系统中，大学与外部世界合作紧密，企业的技术密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有些人可能也在利用博士学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体系中区分自己，以应对饱和的毕业生市场。这种学历主义在商业、公共管理和卫生等专业领域更为常见，它更多是为了提升个人地位，而不是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回应。可以说，其中一些“专业博士”并不符合传统和国际公认的博士学位定义，即通过实质性的原创研究工作获得的学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其博士学位调查中使用的“研究型博士”定义比综合高等教育数据系统更为严格，教育学博士（EdD）和工商管理博士学位（DBA）较少被纳入其中。

另一个极端的证书主义例子是一些公众人物，通常是政治家，因为剽窃而失去博士学位。这表明他们追求知识不是他们的目标。相反，他们利用博士学位来提升自己的职业和社会地位。

对人才的引进是博士学位生产的另一个主要推动因素。在 OECD 国家，五分之一以上的博士研究生是国际学生（而本科生层面国际学生仅为 4%）。在大多数国家，英语已经成为吸引最优秀的外国人才（包括英语非母语国家）的通用语言。许多国家依赖这些移民来支持他们的研究系统。

博士学位获得者毕业后会发生什么？

尽管很多人会尝试，但多数博士学位持有者将无法进入传统的学术界，他们将成为“永久博士后”（permadoocs），在转向学术界之外的工作之前，接连签订一系列固定期限的合同，其中部分毕业生可以在研究领域工作，而大多数的毕业生在非研究领域从事

工作。

不确定性一直是学术职业早期阶段的特点，但随着博士学位持有者数量的增加，年轻一代在向学术界的长期合同过渡方面表现得更不理想。那些成功的人需要具备地理流动性和自信，致力于研究和建立人际网络，并准备忍受漫长的不稳定期。

不稳定性引发了关于公平、多样性和包容性等严重问题，因为来自特权背景的人更有可能不受其阻碍。至于女性，在大多数领域，她们在博士教育中的地位已经与男性相当。但她们在终身教职职位、学术生涯的高层以及在工程等学术界外机会更好的领域中仍然代表性不足。学术职业所需的国际流动性是女性面临的另一个障碍，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女性。

学术界面临的危险是它可能无法再吸引和留住最有才华的人才，因为学术界之外的工作早就提供了无限期合同，以及更好的收入和更好的职业前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学术界的智力回报更高，但从事其他工作的博士学位持有者往往对他们的处境感到满意。学术界必须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否则科学的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已经有一些例证表明，在某些领域，博士后职位变得越来越难填补。

此外，如果继续以超出学术界可吸收的速度培养博士生，那么博士生教育应更好地为候选人在高等教育、商业、政府、私营非营利部门和自雇等各种职业选择做好准备。

这对博士教育意味着什么？

博士生教育的增长导致更多正式、更结构化及受监管的学习项目。它还带来了更多多样化的方法，平衡了传统的学科研究博士学位与为博士研究生准备学术界以外的有益

工作的紧张关系。

对博士学位在学术界以外的价值的担忧已经在所有学科中变得普遍。新的合作博士项目在合作环境中由公共和私人机构共同发起。它们旨在具有与传统博士学位相同的地位，仍然被视为“研究型博士学位”，但追求的是应用而非理论知识。它们对双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优先事项。它们也引发了关于合作中学术诚信和自由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决。

博士候选人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有些人在之前的学习中并非就读该专业，有些博士生年龄较大，也有一些博士生已具备专业经验。这意味单一模式的博士生教育不再适用，需要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博士生教育需要为毕业生做好准备，使他们能够胜任学术界之外的工作，同时也为更广泛的学术生涯要求做好准备，包括研究、教育、社会参与以及领导和管理任务，即学术界内外的多样化职业。

重新思考非洲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实施

万德伍森·塔姆拉特

万德伍森·塔姆拉特 (Wondwosen Tamrat)：埃塞俄比亚圣玛丽大学的创始人兼校长、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 (PROPHE) 成员、非洲高等教育国际网络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执行主任

电子邮件: wondwosentamrat@gmail.com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引人注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有一半位于非洲。然而，这种增长并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对于不断增长的青年人口。为从各级教育系统毕业的 1000-1200 万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已经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一项艰巨任务。

需要关注技能培养和就业创造

与过去不同，年轻毕业生现在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找到工作。技能不匹配以及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所占比例较低是普遍现象。由此产生的挫折感导致自尊心低下、绝望、永久性的国外移民寻找更好的前景，以及犯罪率上升，对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获得相关技能和创造就业机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高等教育领域政策改革的一部分。这在个别政府正在制定的技能发展战略，以及非洲联盟制定 (the African Union) 的“非洲大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战略” (the Continental TVET Strategy) 和“2016-2025 非洲大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战略” (the Continental Education Strategy for Africa 2016-2025) 等区域倡议中得到了广泛反映。非洲各国政府有责任建立能够应对劳

动力市场所需的高等教育体系，以遏制非洲范围内不断上升的失业率。

非洲的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 14 亿增长到 2050 年的 25 亿，到 2100 年将达到 43 亿。届时，预计将有 3.64 亿人处于 15 到 35 岁之间，这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这对于通过发展人力资本、知识创新与传播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适龄人口中，只有 9.4% 的人群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全球平均水平约为 38%。撒哈拉以南地区将 21% 的政府教育支出用于高等教育，27% 用于中等教育，43% 用于初等教育。

应对年轻人对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然而，这些部门的政策改革历史充满了起伏、误解和不良影响，这些因素影响了国家政府所设定的诸多假设和方向。从过去的弱点中汲取教训，并了解不断发展的需求性质，对非洲高等教育系统应对充满挑战且复杂的未来至关重要。

过去的影响和教训

非洲的殖民历史因其造成的诸多损害而广为人知，包括年轻一代与其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根源的疏离。殖民主义的影响，在非洲高等教育机构对前宗主国机构的同构

倾向和依赖性上依然显而易见。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独立后期，非洲高等教育机构承担了国家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和非洲化系统的重大责任，但其成效有限。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人口、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进一步加剧，导致政府收入减少，治理和管理系统效率低下，基础设施差，质量下降，研究成果稀少。这些挑战因世界银行等有影响力的捐助者的政策建议而加剧。这些建议包括在一系列措施中，弱化高等教育，优先发展初等教育，推动公共体系中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并多样化资金来源，包括成本分摊机制。这些政策大多不符合非洲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导致了各种不良后果。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重新强调非洲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推动了非洲高等教育机构重新定位，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引擎。除了各国政府采取的具体行动外，非洲还开展了多项地区和全球承诺与举措，促进其高等教育体系的恢复与振兴。目前，政策改革的需要继续受到老问题和新问题的推动，包括就业能力、数字化、质量和相关性以及公平与不平等。

数字化

非洲需要从使用数字技术中受益，这种转变通常被描述为教育史上最快的范式转变之一。非洲急需投资并现代化数字基础设施，以克服目前有限的互联网访问能力。高昂的费用、缺乏技能和意识，以及文化接受度不足，也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障碍。

教育机构需要将数字化转型纳入战略规划、组织结构和运营流程中。如果政策、实践和观点不发生变化，那么将无法应对数字化带来的迫在眉睫的挑战。

公平与不平等

尽管初等教育阶段在公平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非洲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大陆的高等教育系统不仅以参与率最低而著称，而且在解决来自低收入群体、妇女、残疾人和难民学生的平等获取问题方面也存在着重大问题。

尽管各国应改进其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政策，但非洲高等教育机构同样必须将公平性和不平等置于重要位置，以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共同增长。

质量和相关性

非洲的高等教育在整体质量和绩效方面面临严重阻碍。学生人口的不断增长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课程的相关性仍然存在问题，这在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和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无法建立联系，以及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持续不匹配等问题上都有体现。

在非洲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平均比例估计不到 20%。高级教授很少而且退休速度很快。教师的低工资、缺乏研究资金和设备，以及有限的院校自主权导致许多学者离开自己的国家寻找更好的机会。

提高毕业生质量需要创造有利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加强现有基础设施，制定正式的质量保证体系，以增强该领域的新举措。

结语

非洲的高等教育系统为将非洲大陆的人口增长转化为人口红利提供了机会。这个领域通常被视为消除贫困、促进技术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凝聚力的关键。2015 年 3 月在塞

内加尔达喀尔举行了第一届非洲高等教育峰会 (the First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Summit) , 会上所发表的《宣言与行动计划》 (*The Declaration and Action Plan*) 设想, 到 2050 年, 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与世界其他地区旗鼓相当。参会者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入学机会; 创建财政上可持续发展、高效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系统; 发展多样化、差异化、和谐化、相关性强、灵活和具有韧性的综合系统; 以及能够培养出高技能、创新能

力强、就业能力强、道德良好和具有公民意识的毕业生, 来实现这一愿景。

鉴于这些愿景, 政策制定过程必须充分重新考虑高等教育部门对当前挑战和现实的响应能力。非洲的高等教育机构须特别证明它们对经济、社会需求以及地方社区的相关性。特别需要关注阻碍从政策到期望成果转变的因素, 因为这是整个非洲大陆面临的严重瓶颈, 对应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巨大挑战和不断发展的现实至关重要。

后苏联时期高等教育的三十年改革：成果与教训

安娜·斯莫伦采娃

安娜·斯莫伦采娃 (Anna Smolentseva)：英国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社会学系博士生

电子邮件：asmolentseva@yahoo.com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后，显然，我们需要更多地反思后苏联转型的本质、结果和教训。高等教育只是整个图景的一部分，它无法解释一切，也无法独立于其他社会和政治机构运作。然而，由于它涉及知识、社会规范/价值观和社会价值，因此理解其对社会的贡献非常重要。本文讨论了后苏联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发展情况，以及尽管该地区 15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参与率有所增长，这些发展却限制了高等教育对后苏联社会潜在的贡献。

否认苏联、推动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崛起和苏联体制的逐渐解体大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晚期时期的领导层尝试通过政治和经济自由化以及市场机制来复兴社会主义。后苏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建立在苏联晚期时期的遗产之上。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过去被视为“悲剧性的试验”，一种背离“正常”发展的死胡同。随之而去的还有社会中追求更大公共利益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个体，他们为自己和家人工作，关注自我，做出自由的消费选择，投资于他们的高等教育，并根据预期的劳动力市场结果选择他们的高等教育和职业路径。减少公共资金、市场机制和竞争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一部

分，这个模式在大多数后苏联国家以不同程度实施。高等教育改革与许多其他具有高人类成本的社会经济改革同时进行，这些改革伴随着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

系统层面的变革

30 年来，后苏联国家的变革塑造了 15 个形式不同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这 15 个系统都是从同一苏联模式演变而来的，该模式限制了各机构部门及其声誉追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位置竞争 (positional competition) 的市场有助于强化那些原本就强大的教育机构的优势，并扩大顶级和底层机构之间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机构分层方面，后苏联体系可以与其他市场化体系相媲美。

从机构分类系统、学位系统、教育提供者范围、机构排名、部门隶属关系、基于绩效的资金分配、国家入学考试和其他手段的学生分类等方面，国家进一步塑造了横向与纵向的差异。保持或减少系统层级也是一种政治选择，由于大多数国家拒绝了苏联的平等理想，因此没有政策承诺克服社会不平等。在一些国家，与苏联时期相比，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和女性参与率下降。

机构层面的转变

市场化主要发生在主导的公共部门内，并加剧了系统内的社会不平等，不仅在机构

层面，也在机构内部。所谓的双轨学费制度将每个公立机构的招生分为国家资助和自费两个部分。从苏联时期免费的高等教育转向有偿高等教育的基础可以追溯到苏联晚期时期。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所有 15 个国家都采用了相同的模式。在 13 个国家中，公共部门的学生中有一半或更多要支付学费（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付费学生的比例超过 80%）。公共部门的其他学生接受国家资助教育。与所有其他国际资助模式不同，这一系统并未对所有学生适用相同的规则，维持了社会价值（资金/能力）的双重标准。

尽管金钱至关重要，但它将不平等合法化并促进不平等。特点是，在后苏联社会，人们几乎从不对这个系统提出质疑。它再造（reproduce）了高等教育作为共同利益和平等主义承诺的苏联价值观与高等教育作为私人利益、消费者选择和正常化不平等的后苏联理念之间的文化分歧。但是，只要国家进行干预，就可以减少内在的不平等。例如，2012 年，爱沙尼亚对保持正常学习进度的学生取消了双轨学费制度。

高等教育的目的

新自由主义改革成为重塑高等教育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结果的基础。对于后苏联体系，这种“职业化”更容易被采用，因为它呼应了苏联对国家经济需求的定位。苏联体将高等教育视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工具，用于培养国家经济的干部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培养新的个体，一个没有剥削的平等社会。

尝试克服苏联偏见的“改革”强调了高等教育作为个性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优先考虑了教育的人文目的。基于人力资本理论

和新自由主义的想象，后苏联高等教育将高等教育缩减为经济发展的工具。它关注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能力，但这次是为了个人而不是集体利益。

知识的商品化

或许更重要的是，市场化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核心——知识，使其失去了内在价值。知识变成了一种商品，且以各种形式呈现。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被描述为“资金来源多样化”，所有高等教育都只能销售“知识”。在这里，“企业家大学”的模式非常有用，以确保国家无需采取任何措施，而各机构必须自行筹集资金，而它们确实做到了。最先出售的“知识”形式是高等教育学位，这得益于双轨学费模式的实施。

通过支付费用为在国家考试中表现不佳的学生提供入学机会，使得高等教育中的非卓越现象合法化。这种做法助长了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的观念，而不是展示个人自由选择的胜利。对于长期受到低工资、不稳定就业、缺乏社会地位和分层等问题困扰的学术职业来说，知识商品化导致了高等教育学术核心的侵蚀。这使得应用知识、应用研究和咨询工作的优先级提升，以弥补公共资金的不足。

知识商品化还促进了构建学术论文的大规模市场的发展，包括博士论文、学生论文和期刊文章。一切都变得可以出售。学术价值和学术自由从未在后苏联时期得到巩固，反而因外部政治压力进一步被削弱。

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及其限制

后苏联时期的痛苦经验在于，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影响在改革之初并非未知，这在国际文献中已有讨论。后苏

联转型是全球转变的一部分，这一转变优先考虑个人利益/价值而非集体利益/价值，并优先考虑自然和自发的经济秩序而非政治行动。

尽管过去 30 年中高等教育得到了扩展，我们看到了一些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机构示例，但只有在系统和全球层面实现了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竞争是新自由主义视角的一种迷恋，它将个体学者、学生、机构、国家体制、政治家、国家和社会分开，并使他们无法共同努力以实现共同目标（如和平、

应对气候危机、处理大流行病、追求正义等）。这种情况可以而且应该改变。

注：这篇文章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于 2022 年 2 月 14~15 日举办的“下一代：反思和展望前苏联高等教育”（Next Generation: Reflec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的会议论文。

后苏联地区的掠夺性出版危机

伊克博尔洪·科拉博耶夫

伊克博尔洪·科拉博耶夫 (Ikboljon Qoraboyev)：哈萨克斯坦人文政法大学 (M. Narikbayev KAZGUU) 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 i_qoraboyev@kazguu.kz

在苏联解体 30 多年后，我们目睹的可能是两种平行研究文化的出现和巩固，新旧文化似乎比我们预期的共存时间更长。掠夺性出版问题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平行研究文化的现象。

虽然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掠夺性出版在后苏联国家尤为严重，我们见证了通过网站和日益普及的在线通讯应用（如 Telegram）运作的文章工厂的激增。掠夺性出版不仅仅是一个暂时性问题和“转型成本”的一部分，它正转变为一种自我延续的文化。随着像 Chat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出现，这些工具已经被用来撰写期刊文章或通过法学院考试，掠夺性出版在包括后苏联地区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将变得更加严重。过去辨别一篇文章是否是掠夺性出版的特征之一是其低质量的“蹩脚英语”。随着 ChatGPT 的应用，掠夺性出版的创业者肯定会更吸引那些在国际上挣扎着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

后苏联国家中掠夺性出版的兴起

在后苏联国家，低质量的研究成果占主导地位（主要发表在 Scopus 的 Q3 和尤其是 Q4 期刊中）。掠夺性出版是一种全球现象：根据《自然》(Nature) 杂志的报道，包括付费合著者在内的掠夺性出版实践已经成为一个数百万美元的行业，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在后苏联国家掠夺性出版问题尤为严

重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著名俄罗斯科学项目 Dissnet 的创始人安德烈·罗斯托夫采夫 (Andrei Rostovtsev) 的说法，2012 年引入了一个旨在增加俄罗斯学者在 Scopus 和 Web of Science 索引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目标后，转向掠夺性出版成为一种普遍且系统化的现象。数千名俄罗斯学者开始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论文，遵循“付费出版任何内容”的逻辑。通常，这些文章是其他人撰写并最初以其他语言发表的文章的英语翻译（使用在线翻译工具），这些掠夺性作者邀请其他同事加入共同承担出版成本的合著者。罗斯托夫采夫和他的同事将这一现象称为“已经成为常态的灾难”。2021 年，乌兹别克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发现，引入“发表或淘汰”的逻辑导致乌兹别克斯坦成为 Scopus 停刊期刊文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而这些期刊通常都是掠夺性期刊。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 (Kazakhstani National University) 的教授拉特·凯内索夫 (Bulat Kenessov) 表示，掠夺性出版在 2022 年进一步恶化：哈萨克斯坦在 Scopus 数据库中停刊的可疑期刊中的学术文章比例方面占据第二位。

掠夺性出版：与转型相关的暂时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是否应该将掠夺性出版的兴起视为转型期必然带来的暂时现

象，并期望它在后苏联研究人员成功融入全球研究领域后消退？从这个角度来看，掠夺性出版增加的原因是后苏联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缺乏经验。这种经验的缺乏是由于苏联研究与全球科学社区的孤立所导致的。语言障碍也加剧了这个问题。绝大多数 WoS 和 Scopus 期刊都是用英语出版的，而俄语仍然是后苏联地区，包括高等教育领域的通用语言。

因此，后苏联国家的研究人员需要时间和资源来获取必要的知识、技能和社交能力，以便能够在高质量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有抱负的研究人员往往会被掠夺性出版商的激进营销策略所吸引。因此，掠夺性出版可以被视为后苏联转型的众多成本之一。

掠夺性出版作为一种自我延续的普遍文化？

另一种看待掠夺性出版的观点是将其视为一种持久的现象，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后苏联地区，而且被当地参与者广泛接受和广泛实践。掠夺性出版与其他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抄袭、数据捏造、代笔等）结合使用，用于夸大学术界人员的研究业绩，帮助个人获得他们将用作地位象征的博士学位，或者帮助教师晋升学术职位。例如，在俄罗斯政治精英中，博士学位作为一种地位象征具有吸引力，这导致许多官僚、政治家和高管都追求博士学位（请见 Abalkina & Libman, 2020）。

在后苏联社会，学术出版物和学位的多功能利用导致掠夺性出版的企业家数量激增。我们面临着众多连续创业者和中介机构，他们为潜在的作者和科学家提供在国际数据库中发表文章的作者资格和合著资格。阿巴

尔基娜（Anna Abalkina）分析了名为“国际出版社”的案例，该公司为后苏联地区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在 WoS 和 Scopus 索引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机会，估计通过该公司获得的虚假作者资格在 2019~2021 年期间达到数百个，总营业额为 650 万美元。还有许多 Telegram 频道，例如“Wos-Scopus”、“国际文章”、“会议、期刊”等，为作者提供在带有虚假索引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机会。即使它们没有 Scopus 索引，它们仍然可以作为资格指标，以确保职位、头衔和晋升。

从这个角度来看，掠夺性出版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延续的学术不端文化的一部分，得到了掠夺性出版业的支持。在监管文件中包含科学计量学目标正在创建特定的供需链，其中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作者（合作者）身份被货币化，成本从几百甚至数千美元的 Web of Science 或 Scopus 文章，到仅仅几十美元的自称“国际”在线期刊文章，都有所不同。

结语

在苏联解体 30 年后，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漫长转型导致了平行研究文化的出现。一方面，较少数量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在西方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参与与国际（主要是西方）合作伙伴的合作项目。这一群研究人员在高质量国际出版物方面表现得更好。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人员被本地大学和研究机构雇佣，同样面临着发表文章的压力，但他们缺乏资源、培训和合作支持，无法在优秀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我们目睹的不是真正的转型变革，而是机构和研究人员在适应全球化引入的新现实和压力，以应对“发表或淘汰”的危机。

注：这篇文章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于 2022 年 2 月 14~15 日举办的“下一代：反

思和展望前苏联高等教育”（Next Generation: Reflec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的会议论文。

台湾的私立高等教育：从繁荣到逆境

侯永琪、吕依蓉

侯永琪：中国台湾政治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

电子邮件：yungchi@nccu.edu.tw

吕依蓉：中国台湾东海大学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gracelu@thu.edu.tw

几十年来，中国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政策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其他东亚地区一样，该体系曾受到政府的高度监管。20 世纪 80 年代，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受到压力，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

台湾的私立高等教育

因此，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其私立部门，在机构和学生注册方面都得到了显著和迅速的扩展。到了 2000 年代末，台湾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公立机构。2020 年，149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 102 所是私立院校，学生注册总数为 1,244,822 人，占总学生人数的 68.5%。

台湾的高等教育机构非常多样，符合东亚及其他地区的模式。与日本和韩国类似，私立高等教育在台湾也占据大多数的招生比例。私立机构的类型包括宗教背景的、由企业和产业资助的企业家型、以及慈善捐助的（家族捐赠）。第一所私立大学东海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教育中国联合董事会于 1953 年在台湾重新建立的。目前，台湾大多数私立大学和学院被描述为“需求吸收型”机构：它们主要依靠学费收入，专注于教学密集型项目，捐赠收入有限。事实上，大约一半的“需求吸收型”机构专注于职业教育项目。

只有少数私立大学，如长庚大学、台北医科大学和中国医药大学，可以被归类为半精英机构。这些机构与产业联系紧密，通常拥有医学院，并提供一些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课程。总体而言，它们比第二梯队的公立机构享有更高的声誉。

台湾私立高等教育的政府导向治理模式

在台湾，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部门之间的区别不大。根据 1974 年的《私立学校法》和 1994 年的《大学法》，私立和公立机构受到同样的监管，包括机构的设立、校长的任命、课程开发、财务管理、教职员招聘、学生注册、学费方案等各个重要方面的监管。例如，被机构委员会选中的私立大学校长需要经教育部批准，这一程序与公立部门基本相同。类似地，在《教师法》中，当涉及到教职员工的任命、晋升、停职和解雇时，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区别很小。此外，公立和私立大学必须根据相同的质量标准由相同的质量保证机构进行认证。

有关有限的部门间差异和重要的国家控制的一个有趣方面涉及学费政策。一方面，教育部向私立大学提供以学生数为基础的补贴，以保护学生免受低质量教育的影响，同时确保私立机构的问责制。在 2014~2019 年

之间，这一基金的总价值从 750 万美元增加到 877 万美元，增幅为 17%。目前，教育部的补贴占私立机构常规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所有私立机构，无论是否接受教育部的补贴，都被禁止提高学费和费用。尽管与政治复杂性交织在一起，但这一学费上限政策对机构治理、财务可持续性、质量维护和全球竞争力构成挑战。

在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大学的治理已从“国家主导”模式转变为“多元市场”模式。例如，1997 年修订的《私立教育法》规定，私立大学和学院在其董事会运作和教职员晋升方面具有自主权。然而，教育部仍通过各种外部评审和评估来密切监督质量。

政府在人口变化时代的角色

在 2022 年，台湾的生育率降至 0.89 的历史低点。包括 29 所私立大学在内的 51 所大学共有 1.4 万名学生的招生不足，而接受率则为 98.94%，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人口变化和招生不足似乎引发了国家的双重反应。

一方面，教育部通过《私立教育机构停办法》通过了为了保护学生的学习权利和教师的权益而制定的法案。通过这一“退出计划”方案，教育部打算重新控制招生不足的私立大学。例如，在 2022 年，招生计划不足 60% 的 12 所私立机构被迫关闭。实际上，在制定“退出计划”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教育部一直在密切监测招生不足的私立机构的学术和行政方面。

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应对本地学生招生的急剧下降，鼓励半精英的私立机构加强和巩固其国际联系，并同时更加适应劳动力市场。一些历史较长（从而资源和网络传承充足）、学术重点和业绩突出，或者设有医学院（以追求先进研究和出版物的全球排名）的私立大学开始转型为寻求学术卓越的研究型大学。从 2005~2016 年，长庚大学和元智大学两所私立机构成功获得了教育部“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的资助。获得“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的一些半精英私立机构已经尝试通过各种实习计划来加强与产业的联系并吸引学生。元智大学是一所私立机构，与国际电信和制造业巨头远东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目前逢甲大学、义守大学和辅仁大学采用的则是另一种策略，即寻求国际合作伙伴，以提供跨境合作项目并招收更多付费的国际学生。总的来说，“退出计划”、“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和“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共同产生了促使许多半精英私立大学进行转型的推拉因素，其中一些在全球排名中表现优于公立大学。

尽管公众持续存在歧视态度，台湾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一直在努力展示其问责制，并获得公众信任。然而，人口变化、招生不足、新冠疫情以及该地区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该部门构成了许多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已从政府主导模式转向多元市场模式。

是什么助长并维持了非洲大学的腐败？

乔纳森·D·扬森

乔纳森·D·扬森 (Jonathan D. Jansen)：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教育学杰出教授、南非科学院 (the Academy of Science of South Africa) 院长

电子邮件: jonathanjansen@sun.ac.za

如果一所大学不被周遭社会视为高等教育场所、有影响力的研究基地或产生新思想的论坛，却被视为高度集中的可侵占资源，那该怎么办？

我对南非大学腐败问题的研究当然不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我最初想了解的是，为什么一些高等教育机构长期存在功能失调的问题。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些大学不断经历动荡、学生经常暴力抗议、校园经常停课、治理功能持续失调，以及校园领导层更替频繁？

同时，干预似乎无济于事。当一所公立大学变得不稳定并持续不稳定时，南非的教育部长会任命一名评估员来确定不稳定的原因，并在收到报告后任命一名管理者接管该机构的治理和/或管理职能，任命期限为一年或数年。这样做的目的是重新开始，解决紧迫问题，使大学走上更加稳定的发展道路。在我所研究的大多数大学中，往往会出现旧病复发的情况，不稳定的循环及其病态症状（抗议、停课等）会反复出现，给学术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发现，长期功能失调的核心问题在于大学的各利益相关者（学生、教师、管理者、供应商等）几乎全神贯注于非法获取这些数十亿兰特机构的资源。乍一看，从盗窃基础设施拨款到盗窃学位证书等象征性资源，对机构资源的争夺在物质上似乎是有道理的。

几所更偏远的大学位于并被贫困社区所包围，这些社区的人们住在棚屋中，失业率很高，机会渺茫。但还有一些更险恶的事情正在发生。

连接内部与外部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整个南非社会陷入了工业规模的腐败之中，尤其是在各种用以发展公用事业的国有企业中，从国家火车系统到主要电力供应商。为了描述这一现象，一些书籍探讨了“国家俘获”，即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操纵管理公共资源的规则和法规以谋取私利。

在这种背景下，期望大学，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公共实体，能够幸免于国家内部猖獗的腐败现象，始终是不合理的。来自其他公共实体的利益相关者，如资金短缺、功能失调的市政当局，在大学的管理机构（理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学生和教职员与外部供应商有联系，这些供应商一心想绕过机构规则获得投标机会。总之，腐败网络将大学内外的人联系在一起，因此，每项重要资源都受到腐败分子的密切关注。

接下来的任务是，不仅要更详细地研究大学中的腐败是如何滋生的，还要研究它是如何维持的。我发现有两种机制使腐败机构始终面临崩溃的威胁：一个是机构能力，另一个是机构诚信。

机构能力

然而，机构能力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缺乏治理、管理或行政的能力；这本来是一个有限的问题，可以通过培训和发展轻松解决。问题在于，大学中的腐败分子使这些机构丧失了能力。例如，虽然为从餐饮到园艺等大学服务招标设立了制度化的规则，但腐败分子创建了平行的规则，使他们能够绕过正式安排进行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非正式、非官方的规则成为机构常态，导致从财务到人力资源的所有系统都在不规范的资源争夺中变得无能为力。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与大学教授有联系的政界要人颠覆了第一学位课程的招生要求，使只有中学学历的政治精英可以直接跳级攻读研究生文凭或学位，而无需经过任何机构的进一步审查。在一些案例院校中，至今仍存在着两套平行的制度规则：一套是为多数人制定的，另一套是为腐败的少数人制定的。

机构诚信

机构诚信问题与机构的主流价值观有关。当我将那些在自身危机中依然保持稳定和正常运转的院校与那些在同样压力下倒闭的院校进行比较时，我再次偶然发现了这一概念。这两类大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强烈的学术认同感和学术诚信等机构价值观。事实上，机构诚信度高的大学在治理、管理和行政等各个层面的所有讨论中都以学术项目为核心。任何对学术项目的威胁都会被迅速处理。学校制定了强有力的、毫不妥协的规则，在日常事务中强调学术诚信。

而机构诚信度低的大学则恰恰相反：规则不断变化，可以协商，不良行为很少有后果，领导层往往是破坏规则的同谋。从为新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采购数百万兰特到国家资助的学生资助计划，管理层的注意力被严重转移到保护或骗取这些资源上，而不是推进高等院校的核心活动，如教学、学习和研究。

总之，当使机构能力得以发挥的规则被破坏时，腐败就会猖獗起来，使大学容易被滥用，学术声誉受损。在长期不稳定的情况下，流动性更强的中产阶级学生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大学；渴望有可预测的时间表和不受干扰的研究时间的顶级教授到其他地方寻求学术归宿；而支持大学的主要捐助者则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有些人认为，剩下的不过是一所低水平的师范学院，而不是大多数人认可的大学。

不仅仅是南非的问题

不幸的是，这是整个非洲大陆大多高校的命运。当腐败的大学倒闭时，非洲的中产阶级家庭会把孩子送到南非为数不多的几所好大学或西方国家的大学求学。可悲的是，留下来的都是较穷的学生，他们没有太多的学术选择，教师也没有出色的研究和发表论文的记录。

即使是在混乱不断和腐败猖獗的情况下，一个腐败的组织当然可以通过学生录取、注册、教学、评估和毕业等例行程序模仿高等教育机构。但那是大学吗？

精英私立高等教育寂静的全球革命

菲利普·G·阿特巴赫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荣誉学者

电子邮件：altbach@bc.edu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高质量的非营利性私立大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私立大学，有了小但显著的发展。这些大学在不断变化的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中尤为重要。在学术机构往往非常传统和官僚化的国家，它们为高等教育的组织、课程甚至理念提供了新思路。这些大学往往得到大量慈善事业的支持，拥有大量资源，能够吸引顶尖的学生和教师。

精英私立大学概况

精英私立大学的数量很少，全球大约只有 150 所。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可能占总数的一半，日本和韩国等国也有几所。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拥有顶尖的天主教大学，其他国家也有几所。但是，顶级私立院校的最大增长点目前在发展中国家。

这些大学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十九世纪末，美国富有的资本家赞助了新创建的德国式研究型大学，以加强美国的科研能力。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相继成立，并迅速成为精英学府。当时，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也在日本成立，承担着类似的使命。

发展中国家精英私立大学的兴起

二十世纪中期，一些精英私立大学应运而生。其中包括 1943 年由工业家在墨西哥建

立的蒙特雷技术大学 (the Tecnológico de Monterrey)。十年后，印度成立了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 (Manipal Academy of Higher Education)，随后又成立了贝拉技术与科学学院 (Bir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这些先驱大学目前在印度拥有多个校区，是最好、最具创新性的国家机构之一。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更多的创新型大学相继成立。位于印度浦那的共生国际大学 (Symbiosi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成立于 1971 年，是一所以国际化为重点的院校；韩国浦项科技大学 (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又称 POSTECH) 成立于 1986 年。位于巴西圣保罗的巴西教育与研究院 (INSPER) 成立于 1987 年，以商业、经济学和 (后来的) 工程学为重点。巴基斯坦的 LUMS 大学 (前身为拉合尔管理科学大学) 成立于 1984 年，从一所管理培训机构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在此期间，还有少数大学在其他国家成立。

所有这些机构的创办公理念都与标准的大学精神不同。所有大学都致力于追求卓越，所有大学 (共生大学除外) 都拥有大量的私人资源，因此能够像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一样，在短时间内建立基础设施，聘请高素质的教师，吸引顶尖的学生。所有这些学校都与当地工商业有着密切联系。韩国浦项科技大学由韩国最大的钢铁公司

POSCO 创办，其目标是为韩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提供研究能力、培养人才。同样，蒙特雷技术大学的创始人也看到了墨西哥最重要的工业区对人才的需求，而曼尼帕尔大学的创始人在印度经济增长初期也有类似的愿景。

所有这些大学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它们不断蓬勃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所有大学都将其课程设置扩展到了创始学科之外，而且都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它们都是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而大多数国家的顶尖院校都是公立的。它们在成立之初就有明确的愿景和教育重点，长期以来始终坚持最初的使命，并从一开始就注重教学质量。它们为学生和学者提供的设施和工作条件明显优于本国大多数学术机构。

新举措

二十一世纪为私立精英高等教育带来了重要的新举措。这一发展在高等教育需求巨大的印度尤为显著。印度的公立精英高等教育部门（主要是印度技术与管理学院和几所大学）规模很小，但选拔性很高，因此印度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很大，而且非常需要高等教育来支持印度不断扩大和日益完善的经济。印度的几位亿万富翁和其他商界领袖都非常关注印度对一流大学的需求，并通过提供大量资源来建立具有创新使命的新大学。例如，2009年由一位钢铁大亨出资创办的 O.P.金达尔全球大学（O.P. Jindal University）；由一位科技界亿万富翁出资创办的希夫纳达尔大学（Shiv Nadar University，最近在泰米尔纳德邦开办了第二所大学）；2014年由一群商界和科技界领袖创办的阿育王大学（Ashoka University）；由信实集团（Reliance

conglomerate）投入巨资而新成立的吉奥大学（Jio University）也即将开学。这些机构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校园，提供多个研究生和博士课程，但迄今为止主要培养本科生。所有这些学校都有强调文科的创新课程，并十分注重教学质量。迄今为止，这些新院校主要面向中上层学生，否则他们可能会选择出国留学，而且按照印度的标准来看，所有院校的学费都很高。除少数公立院校外，它们的设施都优于其他院校。

印度可能还有十几所类似的大学，它们只占印度高等教育的一小部分，但在引入高等教育新理念方面却颇具影响力，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大学。

在世界其他地方，由慈善机构创办的精英私立大学似乎并不常见。这方面的例子包括 2012 年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成立的哈比卜大学（Habib University），和 2016 年在中国杭州成立的西湖大学。前者主要为本科生提供文科课程，后者则是一所半私立、只招收研究生的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旨在开发世界一流的、以 STEM 为导向的课程。

“新模式”的重要性

这些“新模式”、资金雄厚的精英私立大学是全球高等教育版图上的重要补充。尽管发展中国家总共只有不到 50 所这样的院校，但它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使命，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要素。也许最关键的是，这些大学在其组织、课程和理念上都反映了与其所处环境中的其他学术机构不同的模式，从而反映了高等教育的新思路。这些要素包括：

- 资金支持：这些大学都是由富裕的个人或企业创办的，因此在各自国家都拥有充足的资金。

● **创新**：这些大学在课程、教学、组织、学生事务以及学术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体现了新理念。

● **顶尖的设施**：这些大学建设了最先进的校园，对学生和教职员极具吸引力，并能开展先进的研究和学术活动。

● **管理**：作为非营利性私立大学，这些大学在管理和治理方式上有别于本国的公立院校，它们通常较少受到国家政治压力的影响，并提供更大程度的学术自由。

● **高素质的师生**：这些大学拥有充足的资源，能够吸引高素质人才。有些大学从国际市场上聘请优秀教师，有些大学则从公立大学“挖”来最优秀的教授。

● **本地质量，全球导向**：通过提供与国际标准相当的教育，这些大学设法将许多原本会出国留学的学生留在国内求学。

● **英语**：大多数大学将英语作为教学和研究的唯一语言或主要语言。

● **国际化**：联系、合作研究、联合学位和其他国际化活动是这些院校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位课程的一部分，学生通常

会获得去国外访学交流的机会。

挑战

大多数精英私立学校（即使不是全部）都依赖于学生的学费收入——这决定了学术项目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学校学费往往很高，因此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无法入学；多样性也很有限。许多大学，如巴基斯坦的 LUMS 大学，针对低收入学生和农村学生设立了强有力的奖学金计划，但总的来说，新精英大学仍然是富裕家庭的专利——事实上，这可能是它们的吸引力之一。这些大学仍以本科院校为主。只有少数几所大学成为了研究密集型大学，在传统学科领域开设了大量研究生课程，尽管有些大学在商学和法学等领域设有备受推崇的专业学院。这些大学可以说是本国最好的大学同时有时也会以全球顶尖院校为基准——这是一个相当高的门槛。尽管面临挑战，但这些精英私立院校为本国往往奄奄一息的高等教育环境注入了活力。

重点建设计划的变革性影响

贾米尔·萨尔米

贾米尔·萨尔米 (Jamil Salmi)：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 (Diego Portales University) 名誉教授、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特聘研究员

电子邮件: 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全球大学排名的出现促使许多大学领导者加入全球声望竞赛，并迫使各国政府推出各类国家层面的学术卓越重点建设计划 (academic excellence initiatives, 以下简称为重点建设计划)。这些计划有别于旨在提高研究能力的常规投入计划。首先，它们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除了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走上这条道路外，其他所有重点建设计划都是在过去 15 年间推出的。其次，重点建设计划的资助对象是大学而不是研究机构。第三，重点建设计划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竞争性，从而在获得额外资金方面就会有输赢结果。

启动重点建设计划的缘由

一些在全球大学排行榜出现之前 (即中国于 1995 年，韩国于 1999 年) 就开始实施的重点建设计划，更具内生性特点，反映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关注。相比之下，第二轮重点建设计划的发展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些国家认识到自身与英美顶尖大学之间所存在的劣势。

第二轮浪潮发生时，“世界一流大学”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的概念开始受到重视，成为一种通过创造先进科学知识来发展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竞争能力的战略。全球地位已成为世界各地的院校和政策制定者日

益关注的问题。

从地理分布上看，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都在欧洲和东亚地区，因为世界一流大学现象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很小。

资金分配模式的转变

重点建设计划代表着一个重大变化，即整个大学都被邀请在竞争的基础上申请额外的资金，而没有成功的保证。遴选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相关特点是将决策权下放给独立专家小组，在除中国以外的许多情况下，这些专家组包括外国同行专家。最常见的方法是采用全面的同行评审程序来遴选最佳提案。

大多数启动重点建设计划的政府逐渐认识到，研究型大学的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止一轮的专项资金。中国在重点建设计划方面的投入时间最长，跨越了过去近 30 年，而韩国则超过了 20 年。

资源调动

用来资助重点建设计划的资金完全来自公共财政，但也有少数国家采取了创新的做法。德国的“卓越计划”涉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最新颖的模式可能是法国的重点建设计划，其资金通过一个大型捐赠基金 (约 95 亿美元) 提供，该基金每年

的收益用来资助入选大学。这种方法提供了其他重点建设计划所不具备的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在投入资金的规模方面，各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突出，在持续几个重点建设计划的支持下，中国顶尖大学获得了很大比例的额外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私立大学是否有资格获得重点建设计划资助时，欧洲和亚洲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有资格参与竞争，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获得了资助，以发展其研究能力。

推动国际化

所有重点建设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支持加速国际化，通过向外国研究人员提供优厚的薪酬待遇和先进的科研设施，以及向国际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吸引顶尖人才，减少学术近亲繁殖。受资助的大学从海外引进了杰出的学者，特别是在中国、法国、德国和韩国。

重点建设计划的成果和影响

衡量重点建设计划的影响并非易事。首先，提升一所大学需要很多年，至少需要八到十年。由于许多重点建设计划都是最近才开始实施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衡量成功与否的尝试还为时过早。第二个挑战与归因有关。要确定重点建设计划是否以及如何带来了可以观察到的积极变化，需要进行深入评估。

入选大学的进步

我们可以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结果来衡量过去 20 年研究密集型大学的表现。

中国的排名上升最为显著，从 2004 年没有一所中国大学进入世界前 200 名，发展到 2022 年有 7 所大学进入全球前 100 名。丹麦现在有两所大学进入前 100 名（2004 年只有一所）。法国在世界前 100 名的大学数量保持不变，而德国和日本则分别减少了 3 所和 2 所。

重点建设计划的首要影响可能是它们培养了大量优秀教师和尖子生。受资助的大学为吸引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做出了巨大努力。它们招收硕士和博士生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

在额外资助方面，中国独树一帜，因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规模是巨大的。中国已成为科研论文的最大生产国，超过了美国和英国。在其他国家，重点建设计划的主要收益可能不是获得了额外的资源。相反，受资助的大学在国内获得了更多的公众认可，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治理改革是重点建设计划所缺失的要素之一，治理改革本可以与发展卓越研究的努力相辅相成并为其提供便利。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做到了。在德国，有关结构性智力障碍的讨论促成了几个州进行了有效治理改革。在德国，一场关于结构性治理障碍的健康辩论促使几个州进行了治理改革。丹麦在 2000 年代初进行了彻底的治理改革，赋予大学更多的机构自主权。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也进行了治理改革，以增加管理的灵活性。

重点建设计划尚未触及的一个治理方面是大学领导人的遴选模式。在大学校长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例如法国和德国，这个禁忌问题还没有被正式提出来，尽管它可能会限制有远见、有魄力的领导者实施长期的改革战略。在大学领导由政府直接任命的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或俄罗斯，任命决定

有可能是基于政治考虑而非专业资格。学术自由也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治理层面。

总的来说，重点建设计划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体现在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比例的提高、用英语教授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外国学者和侨民研究人员的招聘以及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合作研究项目等方面。许多受资助大学的另一个积极成果是学术近亲繁殖现象明显减少。

结语

对重点建设计划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都有一种“没有回头路”的感觉。在政府加强对大学绩效审查的背景下，大学领导者们想方设法使自己的院校在研究课题、教学水平和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具特色，以增强竞争优势。

在认识到全球排名和重点建设计划促使大学之间竞争加剧的同时，大学领导者也不

应忽视合作的好处。加强各大学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可以促进研究。在解决地区性或全球性的科学问题时，如与气候有关的现象和传染性疾病，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

对卓越学术进行更广泛的定义十分必要，而不是单纯按照重点建设计划所倡导的定义。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不应狭隘地关注在精英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而应坚持将社会包容、科学真理、伦理价值、负责任的研究和全球团结等原则作为社会承诺的道德支柱。这些方面可能难以通过排名来衡量，但却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使命。最后，在加强高等教育体系方面，重点建设计划不能替代改革。重点建设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研究密集型大学。作为补充，还可以进行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以提高公平性和包容性，促进创新教育模式，确保可持续的融资，并实现治理现代化。

法国的卓越学术：在卓越与平等之间

安德烈·苏尔索克

安德烈·苏尔索克 (Andrée Surssock)：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高级顾问

电子邮件：andree.surssock@eua.eu

2010 年，针对法国在国际排名中的不佳表现，法国启动了一项重点建设计划，专门为其多所大学提供财政支持。“未来投资计划” (Programme d'Investissements d'avenir) 的最初目标是确保五到十所法国大学在国际排名中名列前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最初目标发生了变化，通过延伸和扩展卓越的定义，囊括了更多的机构和政策目标。

本文讨论了这一扩展如何挑战了国家作为监管的角色以及大学作为战略推动的角色。国家与大学都必须在大学自治继续受到限制的背景下重新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国家发现将其角色从机构活动的推动者转变为资助者和监管者具有挑战性。

在 13 年的时间里，“未来投资计划”的拨款总额约为 960 亿美元，分四期拨付。在此期间，“卓越”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不仅仅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的范围扩展到不同类型的机构，从综合性研究密集型大学到专业性更强的大学；从具有国际抱负的大学到以地区参与为主的大学。除科研经费外，“未来投资计划”还致力于促进教学、博士培训、校园生活、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国际化、治理和管理等方面的卓越发展。

从卓越到“全方位”卓越

卓越概念的延伸在最近一项名为“全方位卓越” (ExcellenceS-Excellence in All Its

Forms) 的重点建设计划中达到了顶峰。计划名称中“ExcellenceS”中 S 被大写，以强调遴选标准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让每所大学制定自己的战略，以实现其特定的卓越，而国家将支持它们确定自己的形象。对许多法国以外的人来说，这似乎缺乏新意。事实上，法国有着悠久的国家中央集权传统，政治上强调平等，因此鼓励各大学明确自身的定位和战略，确实具有变革意义。

“未来投资计划”强调了大学之间的差异化，这一趋势始于 20 世纪，经过三轮发展，新型大学不断涌现。尽管是通过大学合并 (有时是与大学校和研究机构合并)，而不是通过创建全新的机构。

这些发展 (在二十世纪比较缓慢，在二十一世纪加速) 导致了高等教育部门内异质性的增加。这甚至鼓励了那些没有获得“未来投资计划”资助的大学，使其更加突出自己的特色，并在自己的强项上再接再厉。

审计法院 (Court of Auditors) 认为，这种多样性给法国政府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如何找到合适的工具，使政府能够了解这种多样性；如何制定透明的资源分配标准，以及如何监督大学的质量和相关性。

法国政府已被推到了舒适区之外，同时一些大学也设法提高了其战略性，尽管其机构自主权始终受到限制。事实上，从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每

隔几年就会发布的关于大学自主权的记分卡可以看出，法国大学的表现仍然非常糟糕。它们对自己的管理安排（由法律规定）、教职员工（大多为公务员）和研究活动（部分依赖于强大的研究组织）的管理缺乏控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它们的回旋余地极其狭窄。

异质性和同构性

在同构倾向仍然明显的情况下，这中制度异质性又是如何形成的？“未来投资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它们为推动谈判和变革开辟了空间。

首先，几位大学校长率先垂范，为其他校长树立了榜样。这些校长展现了有效的领导力，说服他们的社区采用机构战略，并接受卓越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卓越”在平等主义的法国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其次，对国际评审团的依赖，尤其是负责评审最重要的“未来投资计划”（IDEX、I-SITE 资金）的评审团的稳定性，确保了决策的稳定性。该评审委员会于 2010 年任命，在 11 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同的主席和几乎相同的成员，并努力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决定。政府认识到，评委会不受政治压力和个人游说的影响，无论是来自大学还是政治人物。时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指出，在法国，只有宪法委员会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但政府却破例接受了评审团完全独立运作，以此作为法国大学获得国际认可的条件。

第三，评审团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发挥作用。负责高等教育和研究的部委对评选标准施加了影响，并在将卓越的定义从关注单个大学转向涵盖地区集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其政策更加一致。这意味着最

初对研究实力的关注扩大到将这些集群的管理结构作为核心遴选标准。

“未来投资计划”的影响

“未来投资计划”是否实现了其目标？结果好坏参半。

从消极方面看，创建地区集群和促进合并的一个默示目标是减少因大学校（grandes écoles）的存在而造成的分裂。大学校的存在使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独具特色，其规模较小的院校处于全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顶端，但在国际排名中却几乎不显眼，包括那些研究活跃的院校。大多数大学校都抵制这一政策，声称自己拥有强大的机构品牌和相对于大学的优越感。那些同意被纳入新成立的大学的学校，在国家通过法令允许它们这样做之后，保留了自己的名称和自主权。

此外，学校通过“未来投资计划”获得的额外资金相对较少，无法弥补法国大学与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大学相比核心资金相对较低的不足。然而，“未来投资计划”的额外资金带来了重大变化。在资金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管理变革，让大学员工调侃道：“我们是否应该用三根橡皮筋和两个回形针来实现卓越？”

尽管如此，“未来投资计划”的资金在促进积极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带来了更好的管理和领导，为加强研究、教学和社会参与提供了急需的资金，并改善了战略意图和国际化重点。它帮助几所法国大学在国际排名中名列前茅，并形成了更加多样化的机构格局。

为了巩固这些成果，国家现在必须集中精力确保更大的院校自主权，增加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中国大陆地区的重点建设计划

曹亚楠、杨锐

曹亚楠：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caoyannan@bfsu.edu.cn

杨锐：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电子邮件：yangrui@hku.hk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在高等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特别是针对一批顶尖大学重点投入了资金。这方面的主要举措包括 1995 年启动的“211 工程”、1999 年启动的“985 工程”以及 2015 年启动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计划）。其目的是将中国最好的大学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中国的 112 所大学入选了“211 工程”，并从中央政府获得总额相当于 27 亿美元的资助。“985 工程”资助了 39 所大学，投入资金 79.7 亿美元。“双一流”计划首轮资助了 137 所高校、465 个学科，2018 年至 2020 年投入超过 141.4 亿美元。

入选这些计划的大学名单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自 1995 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在这些项目上投入近 250 亿美元，尤其侧重于“国家旗舰大学”。中国政府一直敦促省级政府为辖区内的参与高校提供配套资金。因此，如果将各省的投入计算在内，公共开支总额将轻松超过 420 亿美元，从而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投资项目。

是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对于上述举措是否成功地将中国最好的大学提升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学者们众说纷纭。2021 年，教育部正式启动第一轮“双一

流”建设评估。在此之前，每所入选高校都要进行校外专家评审和自我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几所大学宣布它们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虽然这种说法得到了它们在全球主要大学排名中不断上升的支持，但却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强调，总体而言，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高校仍有较大差距。

从可量化和可衡量的绩效指标来看，投资回报尤为明显，这一点从全球排名中可见一斑。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几乎所有排名中连续多年大幅跃升的国家。在 2022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中国大陆有 71 所大学进入前 500 名，8 所大学进入前 100 名；而在 2003 年，中国大陆只有 9 所大学进入前 500 名，当时清华大学排名最高，为 201-250 名。在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和“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分别有 7 所和 6 所内地大学进入前 100 名，其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被认为跻身前 20 名。

在中国，全球排名被视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代名词和发展的标杆。在主要关注可比研究成果的排名中，中国大学的关键绩效指标表现出色。2018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术论文产出国，从而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科技论文被引用率前 10% 中被引用最多的国家。在全球被引用率排名前 10% 的科技论文

中，中国和美国分别占 24.8% 和 22.9%。2019 年，中国作者的科技论文中有 1.67% 进入了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 1%，而美国作者的文章中这一比例为 1.62%。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也遥遥领先，占世界总量的 40%。

通过重点建设计划治理高等教育

中国大陆地区通常将这类重点投入项目称作为“重点建设计划”，一直以“工程”为基础。这种做法摆脱了传统的官僚主义财政支出方式，有效地使政府能够灵活、不需均衡地分配资金，为入选的院校创造强大的激励机制。这些项目以明确界定的任务为中心，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量身定制，在不同阶段都有战略重点。尽管不同项目的管理方式不同，但所有入选院校都将国家意图转化为具体任务。这些项目都受到严格的监督和评估。“双一流”计划引入了择优和以成果为导向的竞争机制，表现不佳的大学将被取消入选资格，而表现优异的大学将在下一轮中入选。名单每五年调整一次。

中国的重点建设计划显示出典型的中国式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方式：自上而下、国家主导、追求进取、集中必要资源以求速效，以及相对短期的运动式治理。这些固有特征提出了此类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 and 潜在挑战。首先，这些举措改变了大学的实践和学术文化。为了赢得资金和与项目相关的声誉，大学进行了自我重组，以满足项目的要求，这些要求由简化的全球排名绩效指标和政府主导的评估来衡量。为了提高生产率，大学采用了企业式的管理工具，包括绩效考核制度和与研究论文的直接经济奖励。学术文化日益充满功利主义和短期主义。

其次，中国的重点建设计划助长了高等教育系统中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入选的

大学不断获得丰厚的项目资金，而许多未参与项目的院校却资金短缺，教学和科研差距不断扩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很突出，因为入选的大学都集中在主要的国际大都市和沿海地区。这种政府资金分配不均的现象，促使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大学展开激烈竞争，以争取被列入计划。它们往往以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绩效指标为指导，从而削弱了系统和机构的差异化以及与当地社会的相关性。

第三，尽管中国已崛起为科学强国，但其人文和社会科学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相关学科所掩盖，进展甚微，国际知名度也较低。造成这种差距的部分原因是，重点建设计划本身偏重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认为它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直接贡献。绝大多数机构为获得世界级地位所做的努力都只关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因为这些学科发表的论文更多，被引用的次数也更多，在全球排名和国家评估活动中占有很大比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差距。

结语

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实施重点建设计划的国家中最杰出的案例。中国的范例对那些希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现代化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很有吸引力。在大量和持续的财政支持下，中国的举措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一流大学，并促使它们改变参照系，从而接受国际规范并在全球舞台上竞争。尽管迄今为止，中国的成就主要是量化的，有时甚至是模仿性的，但它们为下一阶段的质变铺平了道路。

中国的重点建设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继续进行，以便在强大的

国家和充满活力的学术体系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自上而下的传统方法在未来可能不再有效。要创建一个支持高等教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就必须

进行深刻的变革。同时，有证据表明，中国在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模式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

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其概念演变的批判性思考

汉斯·德·维特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荣誉教授

电子邮件：dewitje@bc.edu

1995 年，简·奈特 (Jane Knight) 和我曾撰文指出，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并没有一个简单、独特或包罗万象的定义，如果国际化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涵盖一切国际化的事物，那将于事无补。23 年后，即 2018 年，我们撰文指出，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能更加正确，国际化已成为一个非常广泛和多样的概念，包括在不同和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战略。其他人也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多层面和不断发展的现象，其概念仍在不断完善和修订，理论和定义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和不断发展的理解。

正是这两个方面，即多面性和发展性，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我们还可以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几个组成部分，如出国留学、国际学生、在地国际化、跨国或跨境教育、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公民”等术语的使用进行补充。

在后疫情时期和当前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挑战下，重要的是要挑战过去的观念，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确定相关的新方向。

过于草率

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高等教育在使用“国际化”草率的现象，混淆了“为什么”（国际化的理由）、“是什么”（其计划和行动）、“如何”（其组织）、

“影响”（其结果）和“谁”（合作伙伴），忽视了“在哪里”（其背景）。我们还可以说，高等教育机构和国家领导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更倾向于竞争、少数精英的流动性和创收，而不是促进合作和全球学习。

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国际化模式或方法；国际化的多样性由机构、地方、国家和区域所决定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和发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出现的挑战。对历史和地理背景的适应是其优势之一。同时，这种多面性也是其主要问题，因为“国际化”这一术语被利益相关者用于各种不同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强烈对立的）含义和政策中，总体上趋向于竞争和市场化，换句话说，趋向于将国际化视为一种产业。

对国际化意义的影响

2004 年，奈特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将国际、跨文化或全球维度整合到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实施的过程”，这一定义已被广泛接受，其基础是她 1993 年提出的以院校为中心的国际化过程定义。该定义对高等教育部门的国际化维度提出了挑战。以往的国际化方法相对静态、临时且零散，主要基于活动和相关的行政程序，通常隐藏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办公室中，并且常与政府官僚机构相关，被称为国际教育。

相反，奈特的定义强调的是一种涉及广

泛的内部（学术界、学生、管理者）和外部（国家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国际实体）利益相关者的过程方法。奈特将国际化定义为一个过程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误解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并为不同的理解国际化的方法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更多的竞争和经济收入驱动的形式在更传统的合作与交流形式之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方面，从“国际教育”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逐渐转变并没有充分明确其含义和重点，甚至将其重新引向狭隘的经济方向。

反应

世纪之交的 1999 年，欧洲的“在地国际化”、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课程国际化”、美国的“全面国际化”等主张的支持者开始批评将流动性和经济理由作为国际化同义词的做法。为了回应这些广泛的关切，我们及时更新了奈特 2003 年的定义，明确指出国际化进程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并赋予其更明确的方向，将重点放在包容性和社会责任上。因此，2015 年出现了“国际化”的新定义，强调了这些因素。尽管这些概念和 2015 年的定义已成为共同话语的一部分，但在现实中，它们更多地被用作说辞，而不是具体行动的基础。

理论基础

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背后的理论基础在过去四十年中不断发展。1996 年，泰希勒（Teichler）将国际教育研究描述为偶然的、巧合的、零星的和偶发的。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思维发生了演变。1997 年创刊的《国际教育研究期刊》（*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国际化也已成为其他高等教育期刊的主题之一，而且还有更多关于国际化的书籍、博客和网络研讨会。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种由西方学者主导的西方范式的概念，正日益受到更加多样化的全球学者群体的挑战和关注，尽管其总体理论基础仍然相当薄弱。

对未来的批判性思考

我们不应忽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潜力，但也应意识到其各方面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最近一段时期有增无减。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个过程，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含义、背后的理论依据、其计划和组织，以及其结果/影响。接受并描述其多面性以及历史和地理背景的特殊性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由于对这一术语使用不当，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中的国际化已成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障碍而不是解决办法，而且很容易将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和参与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更清晰地表述他们的意图，以及他们在何种背景下使用某种国际化含义及其不同维度。未来十年的关键是需要从短期的新自由主义方法转向长期的社会利益，从国际教育作为少数精英的福利转向全民的全球学习，从西方范式转向全球平等的概念。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并考虑到各国政府和机构往往只在口头上强调包容和平等，继续优先考虑将流动性和收入作为国际化的驱动力，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注：本文改编于汉斯·德·维特的《反思概念演变》一文。de Wit, Hans (2023).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and of Higher Educ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ts Conceptual of Higher Educations Institutions. Cham:
Evolution. Chapter 2 in Engwall, Lars and Springer (forthcoming).
Börjesson, Mikael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全球化：让我们改变英语教学

加雷斯·汉弗莱斯

加雷斯·汉弗莱斯 (Gareth Humphreys)：日本双城大学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ghumphreys@m.sojo-u.ac.jp

尽管还有其他语言在国际层面上使用，但英语现在在更多的国际场所中传播，并且被更广泛多样的人群在更广泛的背景中使用。其他语言可能有更多的母语使用者，比如普通话，但这里的区别在于这些通常是母语使用者。

语境中的英语语言与文化

然而，有更多的人在跨文化交流中使用英语作为接触语言。事实上，据估计全球 80% 的英语交流是在非英语母语使用者之间进行的，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一数字被低估了。鉴于这种全球性的使用，令人惊讶的是，母语使用者仍然被用作学习的基准，标准的语言实践和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文化成为学习的基础。根据这一观点，英语学习的重点应该是培养学习者使其英语接近母语使用者，并采取与英语社会（认知的）规范相一致的文化立场。

但是，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认为英语国家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是铁板一块的观念是不准确的。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多元文化社会可能是高度多样化和多语言的环境。尽管如此，世界各地的语言教育中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需要像（想象中的）英语母语环境中的母语使用者那样使用英语，并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想象中的）固定文化。

鉴于非母语使用者的使用情境多样且人

数众多，已经超过了母语使用者，在英语语言教育中必须替换英语国家的标准和（国家）文化，以帮助学生认识到他们自身背景和使用英语方式的合法性。这种变革呼声并非新鲜事，但由于在教学和学习实践中缺乏广泛影响，值得再次提出这些问题。这有望促使其他地方的教师反思他们自己的教育实践，以及他们所在机构的实践。

传统教育

尽管在语言学习的早期阶段需要一些规章和规范，但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固定英语语言界限之外的语言多样性使用上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一些教材代表了更广泛的语言使用概念，“母语者”往往仍然是主要关注点。这种关注点在于语言权威提供的标准规范使用，包括教材、语法指南和评估框架。特别是，影响力大的国际测试系统（如 TOEFL、IELTS、TOEIC）继续影响许多语言政策和教育实践。此外，这种关注点在许多教师的观点中也很明显。另外，大多数主流教材中涉及的文化元素通常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并且由英语国家文化过度代表。尽管学习文化和文化知识可以是语言教育中有趣的方面，但在涉及英语的跨文化交流时，超越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其使用和用户的多样性。否则，学习者可能无法培养他们自己是英语合法使用者的资源或信心，学习者应有信心认为他们自己是

英语的合法使用者，他们和所有使用者一样，代表着英语语言使用的文化。

全球英语

由于英语用法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不可能事先让学生对可能遇到的所有文化知识和语言变化做好准备。因此，有必要为他们提供某种形式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英语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在“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es）中得到认可，全球英语是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和英语作为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的总称。世界英语是一个既定的研究领域，着眼于世界不同地区的独特和可编纂的使用品种。其重点是标准化和规律性，通常是在不同地方记录使用的语料库中。英语作为通用语与世界英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侧重于涉及英语的互动。它反映了语言在交流中的多种多样的使用方式，其多样性和可变性难以预测，无法通过语料库中的语言数据反映出来。英语作为通用语的重点是个人如何使用个人的多语言资源和其他资源进行交流，其中英语可以作为一种接触语言（尽管不一定被选择）。交流的基础是在协商意义时的适应性、灵活性和通融性，而不是遵守（假定的）英

语为母语者的严格和传统的期望。

近年来，英语作为通用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语言教师，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教学实践，以反映这些现实。我们应该让学生了解英语的全球性质，鼓励他们把自己当作跨文化公民，即与不同文化和社区有联系的公民。这就需要超越对英语标准规范的关注，培养学生在涉及英语的多语言交流中利用不同语言（和非语言）资源的技能。这也意味着将英语与英语国家的民族文化脱钩，帮助学生将自己视为英语的合法使用者，而不论其文化背景如何。在教学中切断英语与英语国家文化的联系，对于让所有英语使用者以更贴近和适用于自己生活和语境的方式学习和使用英语非常重要。

这些都是现实的目标。人们对全球英语教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对其在英语教育中的意义也越来越认可。不过，这似乎主要体现在研究方面。全球英语对实际教育变革的影响仍然有限，而且根据语言政策和机构内部语言管理中的传统语言观点，似乎不太可能取得重大进展。英语教育必须广泛意识到全球英语的问题，并在教育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

短期流动的批判性视角：哈萨克斯坦的经验

阿丽娅·库扎贝科娃、博塔戈兹·伊斯潘贝托娃

阿丽娅·库扎贝科娃 (Aliya Kuzhabekova)：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Nazarbayev University) 副教授

电子邮件：aliya.kuzhabekova@nu.edu.kz

博塔戈兹·伊斯潘贝托娃 (Botagoz Ispambetova)：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博士生

电子邮件：botagoz.ispambetova@nu.edu.kz

本文从批判性国际化视角出发，探讨了教师短期国际流动这一研究相对不足的现象。文章使用了对参加海外短期职业发展项目的哈萨克斯坦学者的访谈数据。数据显示，国际流动和国际化总体上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良性的。学术流动带来了经济效益，并有助于实现培养国际意识和毕业生具备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成功所需的跨文化能力的社会使命。然而，它也可能助长复制现有的不平等结构。

国际化与哈萨克斯坦

国际化已成为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主要途径。自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的改革者一直试图将这个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也不是“全球南方”前殖民地的国家定位为新兴的“亚洲之虎” (Asian tiger)。为努力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发展研究能力，政府采取了若干举措。

政府最先致力于加入博洛尼亚进程，这促进了哈萨克斯坦与欧洲大学之间的国际伙伴关系和不同的流动计划的发展。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政府慷慨支持国家流动计划，其中最著名的是“博拉沙克奖学金” (Bolashak) 计划，该计划最初的设想是为在国外顶尖大学攻读学位提供奖学金。除了“博拉沙克奖

学金”计划，政府还支持国内大学师生的短期流动。这种流动资金直接发放给受助者，旨在支持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以及教师教学、研究和管理技能的提高。

教师的短期流动是指以天或周为单位的流动，而不是以月或年为单位的流动（即教师根据长期合同在国外工作）。最近，与申请学位的国际学生所获得的津贴相比，用于这种短期培训的拨款大幅增加。短期教师流动是全球学术界讨论较少的一个话题。虽然有一些关于学术流动及其益处的研究，但对短期流动的了解较少。对哈萨克斯坦流动学者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对这一问题有所了解。

短期流动：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启示

我们对哈萨克斯坦大学中参加短期流动计划的学者进行了 21 次访谈。参加访谈的人员都是出国前至少有一年学术经验、在国外待过一到九个月、回国后至少在学术岗位上工作过六个月的受聘教师。大多数参与者都是人文学者，他们的目的地都为欧盟国家。

数据分析显示，这种流动对所有参与者都是有益的。一些参与者表示，他们获得了新的教学和研究技能，还建立了有用的网络，这有助于他们在返回哈萨克斯坦后提高工作绩效。然而，数据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流动

主要对东道国的主办院校有益。这些好处似乎也主要以现金的形式出现。虽然东道国的主办院校不遗余力地吸引哈萨克斯坦来访者，但在他们的来访者抵达校园后提供的支持却非常有限。学院导师并没有优先考虑为他们的哈萨克斯坦客人提供建议，这些客人经常被排除在校园内的收费活动（如课程、研讨会和讲习班）之外，而且经常自顾自工作生活。

与之前对国际化的批判性探索结果一致，利益似乎主要归于全球北方的东道国的主办院校，它们可以从中获取其他收入。与此同时，国际教职员工、他们自己本国的院校以及派遣国都将短期流动视为提高个人、院校或国家级研究和教学能力的途径，这对于在知识经济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教师从东道国的主办院校获得的支持很少，短期项目很少能显著提高个人的教学和研究能力。因此，对派遣院校和派遣国产生的效果甚微。总之，我们对短期教师流动的研究结果与其他国际化研究的主要结果是一致的，即这种活动有助于“全球北方”知识霸权和学术统治的再生产。

接待短期访客似乎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的、追求利益的动机驱动的，而不是由大学生产和传播知识（包括与其他国家机构进行互利知识交流）的人文使命驱动的。根据我们哈萨克斯坦研究参与者的报告，主办院校向资助者收取了大量费用，而只给哈萨克斯坦访客提供了表面上体验（主要是观察）其校园的机会。这种服务不需要额外的资金、精力或专业服务。我们的研究所发现的——东道国的主办院校对短期流动性兴趣背后的

理论根基是新自由主义，与许多学者观察到的国际教育交流中“从援助到贸易”的转变一致。这些学者对北方国家的院校提供援助给南方国家的倡议的衰退表示遗憾，并指出这些倡议已被追求利润的项目和计划所取代。

从批判意识到短期流动的公正政策与实践

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践者需要认识到，使这种不公平交流成为可能的是全球竞争话语的正常化，这种话语重申了“全球北方”的文化霸权，将北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置于南方国家之上，将南方国家的大学和个人贬低到一文不值和不被重视的地位，并使南方国家的大学和个人产生一种必须迎头赶上的感觉。这种机制体现在资助者资助短期流动的动机、资助项目的规划和管理方式、教职员工在国外逗留之前和之后所受到的母国院校的待遇，以及他们在东道国主办院校所受到的“服务”。

为了减轻短期流动的负面影响，国际教育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需要促进各方之间的坦诚交流，使他们能够在参与流动计划时清楚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和目标。换句话说，国际合作伙伴需要了解当地的情况和需求，以及个人的期望和利益，并就流动计划的目标达成总体一致。政府和私人赞助方应在其职权范围中对制定和管理短期流动计划的主办院校或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使派遣院校和个人参与者参与到计划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

英国大学参与跨国教育的未来

珍妮特·伊利娃、范吉利斯·齐里吉里斯

珍妮特·伊利娃 (Janet Ilieva)：英国 Education Insight 教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兼董事

电子邮件：janet.ilieva@educationinsight.uk

范吉利斯·齐里吉里斯 (Vangelis Tsiligiris)：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诺丁汉商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vangelis.tsiligiris@ntu.ac.uk

对许多英国大学来说，跨国教育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已成为一项核心活动。2016 至 2021 年间，参与跨国教育活动的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增加了 22% (从 138 所增至 168 所)，跨国教育学生人数增长了 30%。跨国教育的分布逐渐趋于均匀：2021 年，有 94 所高等院校拥有 1000 名或以上的跨国教育学生，而 2016 年只有 74 所。

英国跨国教育趋势概览

英国的跨国教育一直在稳步扩大，到 2021 年，学生人数已超过 53 万。同年，高等院校吸引了约 68 万名国际学生到英国留学。在过去的五年中，跨国教育增长了 30%，这主要是由合作式跨国教育的增长推动的。

具体而言，合作形式的跨国教育目前占英国技术与教育活动总量的 67%，而五年前这一比例为 64%。在本文中，“合作式跨国教育”一词包括两所或多所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包括特许经营或认证安排、学生的教育进程以及通向双学位和联合学位的课程。

相比之下，国际分校活动保持稳定，在研究期间占整个跨国教育活动的 7%。在线和灵活学习活动的比例从 2017 年的 29% 下降到 2021 年的 25%。

跨国教育是否会继续扩张？

最初，跨国教育发展起来是为了吸纳当地未得到满足的高等教育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的主要职责是支持本地高等教育的办学。随着本地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展，跨国教育帮助改善了国际学位的获取，并为多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得益于此，高等教育项目的全球流动性有助于抵御人才外流，并对当地产生积极影响。

过去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参与率不断提高，而跨国教育也在不断发展，以服务于不断变化的地方高等教育体系。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000 年的 8% 增长到 2021 年的 64%，增长了八倍。虽然跨国教育不断扩大，但其主要重点已从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转向提高质量，以及提供优势学科领域的培训和研究。马来西亚是开展跨国教育项目的另一个热点地区，它也吸引了著名的国际大学来此设立分校。跨国教育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在全球的吸引力，增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跨国教育活动仍在继续扩大，十多年来，这两个国家一直是英国跨国教育的最大东道国。

希腊也有类似的生命周期。20 世纪 90 年代初，希腊出现了跨国教育，以填补当地

高等教育的供给缺口。目前，希腊是高等教育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跨国教育仍在继续增长。

在全球范围内，跨国教育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以促进当地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提高当地学生学习国际课程的机会。对全球高等院校而言，跨国教育提供了一种在对环境影响最小的情况下为偏远地区的学生提供教育的手段。依赖于学术和行政人员大量物理流动的模式被那些在当地提供教学和学生支持的模式所取代。后者以全球教育枢纽的形式存在，其中多所外国大学利用共同的本地基础设施高效地提供跨国教育项目。一个例子是希腊的大都会学院全球大学枢纽（Metropolitan College Global University Hub）。

跨国教育也最适合应对中低收入国家与工作场所相关的快节奏变化和人口挑战。现有的数据收集结构尚未涵盖新形式的跨国教育，但它们满足了持续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的需求。例如，在线微证书、高管教育和技术课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尤其是成人学生。

如果将这些活动考虑在内，我们就可以理解，技术与创新教育是全球高等教育市场发展和创新的驱动力。

监管和政策环境的发展

要使高等教育机构、其学生和当地社区充分受益，就需要一个支持性的政策框架。最近在多个国家开展的研究表明，有关技术与创新教育的监管和政策环境在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放宽法律规定，鼓励开展更多的跨国教育活动。过去五年来，此类变化的例子包括：

- 埃及《2018 年第 162 号关于建立和组

织国际分校的法律》。

- 印度《教资委关于从 2022 年起与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开设姊妹大学、联合学位和双学位课程的规定》。

- 印度尼西亚研究、技术和高等教育部自 2018 年起实施的《印度尼西亚国际大学条例》。

-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大学合作提供学位课程的政策》。

- 菲律宾于 2019 年刊发的《菲律宾跨国高等教育法》。

这五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人口占世界高等教育人口的 23%，高等教育学习者超过 5400 万。除了规范跨国教育的参与，一些国家的政府还资助并积极支持有利于本国青年的跨国教育活动。这类由政府主导的举措包括为：

- 设立国际分校指定区域，如埃及的新行政首都区、印度的国际金融科技城（GIFT-City）倡议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特区。

- 资助计划，如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与英国文化协会合作开展的计划，如通过菲英联系联合开发特色课程，以及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提高入学率和竞争力。

结语

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将跨国教育作为其核心活动之一。供需因素都在继续推动这一趋势。

政策制定者通过放宽监管和政策框架，越来越多地支持这种参与。然而，一个继续引起争议的领域是政府支持的精英主义国际合作方式。有几个国家将其跨国教育监管框架与国际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表现挂钩。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规定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国际合作的目的。同样，在高等院校层面，全球参与议程和合作伙伴的选择往往局限于与

资源相关的标准，这可能不利于规模较小但质量良好的海外合作院校。

跨国教育对当地产生巨大影响，并明确响应可持续发展议程。例如，跨国教育不断发展，以满足非典型学生群体的需求，如成年学生或有工作和家庭负担、残疾或经济拮据的学生。因此，跨国教育扩大了原本可能无法接受教育的人群的受教育机会。这一重大贡献没有得到充分报道，在有关跨国教育

的公开讨论中也常常被忽视。最近开发了一个专门的在线门户网站来记录这一影响。

最近的市场、监管和政策发展表明，在跨国教育的生命周期中，重点已转向质量、影响和多层次合作。有了正确的政策框架和合作伙伴，跨国教育的参与将为大学创造机会，以具有影响力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方式发展其全球影响力。

“雷达之下”：美国的海外大学

凯尔·朗、赛安沙·帕南吉帕里

凯尔·朗 (Kyle Long)：全球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计划 (the Global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itiative) 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 longkylea@gmail.com

赛安沙·帕南吉帕里 (Saiansha Panangipalli)：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文化关系官员

电子邮件: saiansha@yahoo.co.in

媒体对国际分校的报道可能微不足道，因为报道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机构。美国媒体上为数不多的头条新闻通常是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和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等资源丰富的院校在海外的的发展。报道通常传达的是坏消息，如违反学术自由或劳动法，或校园即将关闭。公众将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小部分人身上，给人的印象是美国的海外高等教育是精英的、轻浮的。

但这种看法掩盖了现实。数以百计的鲜为人知的机构在海外提供美国高等教育。除了分校之外，还有独立院校、微型校园以及提供美国学位课程的国际联合大学。它们的规模、课程设置和质量各不相同。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在海外的情况与在国内一样多样化。美国大学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由美国领先的 65 所研究型大学组成，但只占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 1%。因此，毫不奇怪，绝大多数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外也是默默无闻的。

全球美国高等教育

当然，名牌分校遍布全球，为成千上万的学生提供教育。但是，真正扩大美国全球

影响力的，是那些并非“显眼”的机构。例如，位于密苏里州的地区性私立大学韦伯斯特大学 (Webster University) 在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地区和欧洲开设了 10 所国际分校。美国国际大学孟加拉国分校 (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Bangladesh) 拥有超过 1 万名学生，课程种类繁多。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州立学院 (SUNY Empire State University) 在世界 6 所分校提供全日制学位课程，这些院校大多位于地中海周边。这些大学可能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它们将美国的高等教育课堂带到了世界各地。

现在，“全球美国高等教育” (Global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研究计划提供的一个新的公开数据库使有关各方能够探索这些机构的整体情况。“全球美国高等教育”数据库显示，在 80 个国家有 262 所活跃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它们共招收了约 72 万名学生。相比之下，美国本国内约 6,000 所高等教育机构招收了 76 万名国际学生。本文通过重点介绍美国一些较有代表性的院校，使人们对美国海外大学的刻板印象可有细微的变化。

独立院校

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分校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行业标准。在此之前，流行的模式是独立学院。最早的独立学院由美国传教士于 19 世纪下半叶在地中海东部和中国建立。与旗舰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始建于 1866 年）一样，美国的海外独立大学通常在名称中使用“美国”或“美国的”。即使在传教士时期之后，这种模式依然存在。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企业家开始在西欧建立独立的美国大学。冷战结束后，独立的美国大学开始在东欧和中亚出现，后来成为主流模式。

但是，独立学院并不总能获得先行者的荣誉。例如，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与卡塔尔基金会（Qatar Foundation）合作成立的卡塔尔威尔康奈尔医学院（Weill Cornell Medicine in Qatar，2001 年成立）自称是美国境外的第一所美国医学院。虽然它可能是第一所在美国境外提供医学教育的美国大学分校，但有史以来第一所美国境外医学院的殊荣属于加勒比海美国大学医学院（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the Caribbean School of Medicine），该医学院于 1980 年开始办学，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该地区运营。随后又有许多其他学校相继成立。

加勒比地区的情况代表了美国海外独立大学的普遍情况。对质量的担忧是合理的。在加勒比地区的美国医学院，住院医师安置率低，学生债务负担重。这与全球独立大学的质量状况一致：只有三分之一在美国获得认证。其中一半以营利为目的。在加勒比地区，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这促使美国参议院出台立法，加强对接受联邦学生援助的外国医学院的问责。

尽管如此，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些院校仍然培养了大量在美国工作的有色人种医生。

事实上，美国的独立大学在教育边缘化人群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尽管它们作为被忽视者的避难所的角色经常不被认可。例如，位于苏莱曼尼的伊拉克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Iraq）近年来招收了数百名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学生。美国高等教育的独立模式往往能走到分校走不到的地方。例如，基辅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Kyiv）于 2022 年秋季开学。

国际分校

在活跃的美国国际分校中，67 所中只有 6 所隶属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U.S. News & World Report, U.S. News Ranking）前 50 的院校。西雅图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Seattle）开设了 5 所授予学位的国际分校：1 所位于希腊，4 所位于加拿大。华盛顿州也是营利性迪吉彭理工学院（DigiP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所在地，该学院在新加坡和西班牙开设了可授予学位的分校。在这种情况下提及营利性分校并非异常。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前 50 的院校相比，营利性院校在美国国际分校中所占的比例更高。

位于中心城市的分校最受关注。例如，卡塔尔的教育城和韩国的仁川全球校区都拥有多所著名的美国大学。但数据显示，美国分校更多是在北美或欧洲，而非中东或东南亚地区孤立运作。一些批评者认为，分校的兴起不过是为了抢钱。的确，卡塔尔的院校从东道国获得了大量补贴。但大多数美国院校的分校依靠的是学费，这些院校招收的学生数不多，往往不足千人。

提供专业学位课程的小规模独立校园是一种常态。西班牙伯克利音乐学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德国恩布里-里德尔航空大学（Embry - 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法国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就是典型代表。具有美国特色的文理学院分支较少,但在德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匈牙利(麦克丹尼尔学院[McDaniel College])和西班牙(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仍有显著的表现。这种模式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得以在对民主价值观持不同观点的环境中继续存在。2018年,当匈牙利政权迫使独立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流亡国外时,麦克丹尼尔学院(McDaniel College)得以保留下来,因为它是一所在美国开设课程的国际分校。

结语

在苏联解体 30 年后,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漫长转型导致了平行研究文化的出现。一方

面,较少数量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在西方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参与与国际(主要是西方)合作伙伴的合作项目。这一群研究人员在高质量国际出版物方面表现得更好。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人员被本地大学和研究机构雇佣,同样面临着发表文章的压力,但他们缺乏资源、培训和合作支持,无法在优秀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我们目睹的不是真正的转型变革,而是机构和研究人员在适应全球化引入的新现实和压力,以应对“发表或淘汰”的危机。

“全球美国高等教育”数据库还包括相关微型校园、国际联合大学以及在美国获得认证的外国机构的信息。这些信息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全球高等教育的能力、多样性和模糊性。

吉尔吉斯斯坦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体系：成就与挑战

奇娜库尔·瑞斯库洛娃

奇娜库尔·瑞斯库洛娃 (Chynarkul Ryskulova)：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美国大学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艺术、人文和传播系教授

电子邮件：ryskulova_ch@auca.kg

苏联解体、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以及国际捐助组织的影响塑造了吉尔吉斯共和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系统。目前，全国共有 73 所高等教育机构 (33 所公立和 40 所私立)，在校学生 219030 人。该系统面临着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其特点是腐败和质量低下。

吉尔吉斯斯坦没有达到博洛尼亚进程的领土要求，但遵循了其中的一些原则。教育和科学部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如三级学位结构、欧洲学分制、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课程和能力本位教育，以及根据法律文件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教育法》修正案对教育机构进行独立认证。该法于 1992 年首次通过，随后于 1997 年、2003 年和 2013 年进行了修订。此外，独立的 30 年间还通过各种概念、法规和政策。根据该法，国家负责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

独立认证的成就与挑战

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独立认证，实施了新的质量保障体系，目的是保证质量和融入欧洲高等教育区，六年过去了。吉尔吉斯共和国教育和科学部国家认证委员会承认五个地方独立认证机构和一个哈萨克斯坦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地方独立认证机构与欧洲质量保障网 (European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TEMPUS (欧盟)、中亚质量保障网 (Central Asian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中亚工程教育质量 (Qualit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entral Asia) 和德国国际合作教育组织 (the German Corpo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等国际组织密切合作。所有这些机构都支持地方机构在吉尔吉斯斯坦实施独立的资格认证。认证的实施应使教育机构能够建立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的机制。

从苏联的质量控制方法过渡到欧洲高等教育区采用的新质量保证做法，并非一帆风顺。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包括认证过程管理不善、教师培训不足以及对质量文化本质的误解。苏联的国家认证体系以投入评估为基础，而新的独立认证则以结果评估为基础，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估教育项目质量的主要挑战是从投入评估向成果评估的转变。

由于缺乏培训，大学教授和管理人员并不完全理解每项评审标准的目的；一些评审标准和准则令人困惑，并且在标准与标准之间重复。自学指南没有准备充分，由于从英语到俄语的翻译不当，最终出现了语言混乱和用词不当的情况。例如，“教师” (faculty) 一词在俄语中被翻译成“系所” (department，因为 department 在俄语中是 fakultet)，质量文化被解释为教授在课堂上的道德行为，这可能会误导评审人员、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

各级评审过程管理不善，无论是评审机构还是高等教育机构，从而导致对评审目的和标准的误解。整个过程耗费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所有的评审专家都擅长评估研究、教学方法和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因为评审机构只是举办一到三天的研讨会来培训新系统的专家，这当然是不够的。这些新认证的评审专家的资质和评审质量令人担忧。考虑到公众对后苏联时期腐败和教育质量低下的讨论不绝于耳，即使质量没有明显提高，所有教育项目也都通过了认证。例如，为查明持有假文凭的人而对政府官员进行的大规模审计表明，有些人仍然购买大学文凭。

当前的质量管理问题

影响评审过程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机构结构（如机构研究办公室）、缺乏专业的专业评审机构以及高等院校报告学生学习情况的现有机制。由于没有院校研究办公室来支持机构评估，收集和分析有关教育实践和内部质量控制政策的数据，高校只能在评审专家来实地考察前几个月收集评审数据。这是苏联遗留下来的国家认证程序，这种程序提倡美化，目的是用漂亮的内部评估报告打动评审专家。此外，吉尔吉斯斯坦没有独立的专门专业认证机构，因为认证系统由教育和科学部控制。一个评审机构无法对各领域的所

有课程进行评审，也无法让社会了解教育质量。此外，如果没有院校研究办公室系统地收集和分析教育数据，并将这些数据用于不断改进教师培训和学生学习，那么高等院校就无法提高机构效率，也无法向利益相关者通报其学术课程的质量。

结语

吉尔吉斯斯坦有必要建立专业认证机构，对各领域的学术课程进行外部评估。同样重要的是在高等院校内部设立院校研究办公室，以收集和分析有关教育实践和内部质量控制政策的数据。现有的评审标准和准则对评审过程的参与者来说不够明确，需要修订和完善。高校和评审机构需要完善评审管理制度，对教师进行再培训，提高教育质量。

注：本文为“下一代：前苏联高等教育的反思与将来”会议（Next Generation: Reflec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撰写。该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UNESCO IESALC）和俄罗斯国立研究型高等经济学院（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于 2022 年 2 月 14-15 日主办。

亚美尼亚高等教育中“良好实践”的困境

苏珊娜·卡拉哈尼扬、罗伯特·卡恰特良

苏珊娜·卡拉哈尼扬 (Susanna Karakhanyan): 亚美尼亚国家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基金会 (National Center f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Foundation) 认证委员会创始主席、现任成员

电子邮件: s.karakhanyan@gmail.com

罗伯特·卡恰特良 (Robert Khachatryan): 亚美尼亚埃里温国立大学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研究员

电子邮件: robert_khachatryan@yahoo.com

将“良好实践”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并加以推广, 希望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制度能够趋于一致并相互认可, 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一个重要发展。尽管出发点是高尚的, 但由于环境、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 这种转让和传播受到了阻碍。

借鉴良好实践

将从先进系统借鉴来的良好实践传播出去取决于多种因素, 如经济和社会需求、变革推动者、隐性和刚性机制, 以及驱动这些实践植入系统的价值观等多种因素。除非结合实际情况并以系统需求为前提, 否则良好的愿望很可能在途中失败。

前苏联各国受到先进高等教育模式的启发, 开始推广以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前提的良好做法。再加上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和大众化, 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浓厚的苏维埃传统与新的现实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同时努力恢复民族特性。直到 2005 年亚美尼亚正式加入《博洛尼亚宣言》(the Bologna Declaration) 之前, 亚美尼亚高等教育一直在经历高等教育模式的渐进式变革, 这种变革主要由主导高等教育机构发起。在批准《博洛尼亚宣言》之后, 亚美尼

亚政府率先进行了改革, 尽管已经过去了 18 年, 但系统性和制度性的变革仍受到质疑。与此同时, 亚美尼亚的高等教育系统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差异化, 出现了新型的办学机构。目前的高等教育格局由综合性和专业性大学、研究所、学院、音乐学院组成, 它们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 即国立(公立)、私立、政府间、跨国界。机构改革包括引入以自主权与问责制平衡为前提的新管理模式、启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课程改革。

不断变化的治理结构和资质要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苏联的做法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决定给予高等院校更多的自主权, 并将权力下放给由不同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校董会。尽管该国雄心勃勃地希望建立一个可持续和自主的高等教育体系, 并与强有力的问责制相平衡, 但其成果仅限于作为欧洲一体化承诺的一部分而采取的行动, 而不是有意义的系统性变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2014~2018 年通过的监管框架允许公立高等院校获得新的法律地位, 即从国家非营利组织转变为基金会。虽然旨在加强自治和企业功能, 但 11 所国立大学的经验表明, 在促进

民主化和提高竞争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就。2019~2022 年，亚美尼亚当局提出了一项新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法草案，该草案实际上限制了高等院校的自主权，并将更多的权力交还给政府，从而进一步挑战了该系统的民主化能力，从而与国际上常见的“良好实践”渐行渐远。

在莫斯科规定的所谓国家标准的指导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学历性质和水平因 2011 年基于《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采用的《亚美尼亚国家资格框架》（*the Armenian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而发生了转变。虽然《欧洲资格框架》促进了学术自由，但未能理解西方系统背后的逻辑及其成功因素，导致苏联和欧洲学历资格的共存。尽管采用了《亚美尼亚国家资格框架》，国家标准——一种苏联时代遗留的对高等教育机构课程内容施加影响的遗产——并未停止运作。通过《亚美尼亚国家资格框架》引入的两级体系（学士、硕士）事实上与苏联学历中五年制专科文凭加两级研究生博士学位（理科候选人和理科博士）并存，弊大于利。因此，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医学和健康科学，新引入的学位水平往往被认为缺乏合法性，未被市场认可，导致失业率上升。

改革议程上的其他“良好实践”包括：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通过引入“预期和已实现的学习成果”来实现课程的现代化；相关的评估方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发言权和选择权。然而，满足变革推动者需求的良好实践的关键因素被忽视了。例如，欧洲学分转移与累积系统（ECTS）的引入，几乎没有达到其主要目的，甚至在机构层面都没有付诸实施，更别说在整个系统内外了。

前进之路

亚美尼亚高等教育的关键系统转型和成功之一，是根据博洛尼亚行动方针建立了独立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在苏联时期，质量保障（许可和检查）完全集中在亚美尼亚共和国教育部，由指定的检查员根据国家标准进行。2008 年，通过建立一个以欧洲实践为前提的独立的国家质量保障机构，并引入程序和内容变革，发生了切实的转变，确保了对机构绩效的独立和客观评价。国家职业发展质量保障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Quality Assurance*）在欧洲和国际上都被公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质量保障机构，其运作符合欧洲标准和准则。该中心分别于 2017 年和 2022 年获得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和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注册机构（*The 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er for Higher Education*）的认可。尽管在建立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成功，但高等院校的内部质量保障仍然主要服务于合规目的，并没有促进持续的质量提升，从而导致了质量文化的失败。

通过传递和扩散良好实践来民主化亚美尼亚高等教育并提升其竞争能力的雄心壮志，由于对变革推动者投入不足，尤其是未能认识到文化和背景在设计改革中的关键作用，而偏离了期望的轨迹。深入理解在特定文化和背景中促成有效变革的因素，明确的愿景和价值观，竞争战略和优先事项，对系统和社会需求的全面分析，政府的完全承诺以及对变革推动者的授权，对于成功扩散良好实践至关重要。

注：本文为“下一代：前苏联高等教育的反思与将来”会议（Next Generation: Reflec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撰写。该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

高等教育研究所（UNESCO IESALC）和俄罗斯国立研究型高等经济学院（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于 2022 年 2 月 14-15 日主办。

研究评估：解读指标驱动的压力

伊曼纽尔·库尔奇茨基

伊曼纽尔·库尔奇茨基 (Emanuel Kulczycki)：波兰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学术交流学教授

电子邮件：emek@amu.edu.pl

在危机时刻，人们最能感受到科学发现的深远影响，推动 COVID-19 疫苗开发的突破性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当代科学越来越以出版为导向，而不是以发现为中心。发表论文的无情压力使研究人员几乎没有时间从事实质性工作，导致发表论文数量激增，尤其是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学者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希格斯 (Peter Higgs) 认为，他在学术界的生产力达不到今天的标准。然而，仅仅增加出版物的数量是不够的；科学界真正的货币是被引用的次数。

《评价游戏：出版指标如何影响学术交流》(The Evaluation Game: How Publication Metrics Shap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以全新的视角探讨了学术界指标的起源和后果，并提出了加强研究评价的建议。通过研究研究评价实践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探讨这些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形式，本书引导该领域采用一种更加平衡和有效的方法来评估学术工作。

衡量标准和研究评价制度的激增

随着大学越来越受市场导向逻辑的支配，对问责制和学术生产力量化的强调也在不断加强。这些转变的影响是广泛的，也是学术界持续争论的主题。

衡量标准的应用无处不在，其目的多种多样，如评估研究人员个人、评价赠款获得

者的成功，或衡量和比较学术机构的生产力。期刊影响因子仍然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在美国，40%的研究密集型大学在评审、晋升和终身教职文件中参考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影响因子最初是用来评估期刊读者群的，如今已发展成为评估研究领域各个方面的综合工具。此外，还有一些自上而下、基于指标的解决方案是在国家而非机构层面实施的。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芬兰、挪威、波兰和英国（都实施了推动卓越研究的重点建设计划），都建立了国家研究评估体系。这些体系不仅赋予政府监督其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门活动的权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赋予政府分配整笔拨款的权力。

长期以来，科学界一直在努力抵制对衡量标准的误用和滥用。《旧金山研究评估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和《莱顿宣言》(Leiden Manifesto) 等倡议努力完善评估科研成果的方法，并在这一过程中以资助机构、学术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为目标。

不为人知的历史及其后果

《评价游戏》一书讲述了不为人知的科学测量历史。其中之一是地缘政治层面对出版压力的反应。这些反应各不相同，并受到研究评价体系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美国、西欧和东欧对衡量标准的

信任程度和对专家的不信任程度也各不相同。

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使用的措施和度量标准的现代化潜力进行广泛探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反应的差异。这项调查揭示，学术界监测和评估中使用的度量标准在俄罗斯实施的时间比新自由主义逻辑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时间早了一个半世纪以上。因此，出于对当前不同国家研究界对衡量标准的不同反应的好奇心而开始的研究，导致了苏联第一个国家研究评价体系的建立，主要目的是确保研究符合国家的价值观和政策目标。

研究学术交流测量的起源还揭示了与科学起源及苏联科学计量学的角色相关的第二个未被讲述的历史。科学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启发科学政策变革的工具，而受到波兰方法启发的苏联科学计量学为各种研究评估系统奠定了基础。这些系统的遗产在今天的欧洲许多地方仍然存在，表现为对指标而非专家的特殊依赖。

玩转评估游戏

对研究人员和大学的评估引发了对评估期望的各种反应。一些基于指标的系统成功地促使研究人员调整其出版策略，瞄准质量更高、声誉更好的渠道。相反，另一些研究人员则选择遵守评估规则，以最小的个人代价满足基于指标的期望，结果往往是在声誉较低的刊物上发表大量偶尔质量较低的论文。然而，这种做法的很大一部分不应被称为“游戏”，而应被称为“玩评估游戏”。

《评价游戏》一书中提到，“博弈”一词不能准确地概括研究人员为应对出版压力和评估指标而改变其专业交流做法的方式。研究人员会发表更多低质量的论文，而不是以发

表一篇优秀论文为目标，因为（从他们所接受的评估制度的角度来看）对保持他们的地位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论文的数量。换句话说，参与评估游戏的研究人员并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维持现状，这是他们的主要动机。

使用指标，但不要受其支配

学术界无法摆脱衡量标准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改变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可以简化为在个别机构工作的个别研究者所发表的出版物。同时，我们也无法回到科学管理和组织中没有衡量标准和措施的状态，因为这种状态从未存在过。衡量标准一直以来都被使用，无论是作为现代化的工具还是作为监测和监督的手段。

《评价游戏》一书敦促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研究人员接受七项原则，以改进学术交流系统，实现指标平衡。首先，培养一个能够激励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追求卓越的学术界。第二，通过整笔拨款大幅增加持续的研究经费。第三，确保稳定的就业和有竞争力的薪酬，尤其是对早期职业研究人员而言。第四，让研究人员参与制定评估标准和指标。第五，使评估非个人化，承认现代科学是一项协作努力。第六，让学术界管理关键的学术交流基础设施。最后，确保评估的透明度和可及性。通过采纳这些原则，我们可以营造一个更加平衡、有效和协作的学术环境，让质量优先于数量。让我们确保我们的目标、价值观和信念能够指导度量标准的使用，而不是为了满足衡量标准驱动的目标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注：本文基于《评价游戏：出版指标如何影响学术交流》（*The Evaluation Game: How*

Publication Metrics Shap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一书，该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2023 年出版。

中美科研合作中“关系”的益处与局限

莫里斯·新木·陈、约翰·豪普特、胡蝶、温文、珍妮·李

莫里斯·新木·陈 (Morris Hsin-Mu Chen) :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博士生

电子邮件: morrishchen@arizona.edu

约翰·豪普特 (John P. Haupt) :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专家

电子邮件: hauptj@arizona.edu

胡蝶: 中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

电子邮件: hudie311@gmail.com

文雯: 中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 wenwen@mail.tsinghua.edu.cn

珍妮·李 (Jenny J. Lee) :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电子邮件: jennylee@arizona.edu

随着美国和中国争夺全球知识经济的头把交椅, 国际合作研究日益受到更多政治化和安全化的影响。新冠疫情加剧了现有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导致政府和机构对国际合作的监督力度加大。鉴于这些事态发展, 我们对中美科学家如何继续合作开展新冠疫情研究颇感兴趣。我们的文献计量学研究结果表明, 大多数关于新冠疫情的中美出版物中至少有一位华裔科学家/作者居住在美国。在我们最终调查的 241 名科学家样本中 (美国, N=91; 中国, N=150), 以“关系” (guanxi) 为形式的华裔科学家文化在塑造科学家网络和知识生产能力、疫情对他们合作经历, 以及科学家如何驾驭两国间安全化的研究环境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系 (guanxi) 是一个中国术语, 指的是由共同的文化知识和经验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关系的基础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其个人定义的互惠纽带构成了更大关系网络的基

本单位。关系与西方的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和网络 (networks) 概念不同, 西方的社会资本和网络概念往往侧重于网络结构和个人在网络中的地位。中国是一个高度关系化的社会, 一个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中国人 (或任何了解并践行“关系”原则的人) 在文化上都有义务在自己的网络中有求必应。有许多方法可以区分关系的类型, 这取决于建立关系的背景 (如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家乡等) 或涉及关系的互动的性质和目的 (如爱和归属感、资源交换)。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其在特定时间或特定环境中的状态会触发不同的互动原则和潜在结果。

关系促进中美合作

我们的研究表明, 与美国的非华裔科学家相比, 美国和中国的华裔科学家认为共同的文化和种族是更重要的合作动机。华裔的关系网络使他们能够更容易、更快速地

获得样本，并在疫情初期获得第一手资料。这些发现强调了在非危机时期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华裔科学家利用他们的海外关系网络发展国际研究关系，并以更高的研究产出效率发表论文。关系还促使在中国完成部分学业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关系具有很强的情感维度，其工具性和情感性有助于促进科学家国际合作的互惠性与动机。关系所规定的情感和社会规范，包括互惠、义务感和长期公平，使中美华裔科学家能够更好地改善“弱关系”，最终形成更强的合作关系。

关系有助于参与研究项目

由于中国在新冠疫情之初就掌握了大部分病例和数据，一些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利用“关系”获得关键的研究数据、样本、临床专业知识等。例如，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报告说，他与中国几个地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华裔科学家和员工之间的牢固信任和关系使他能够更好地了解情况，并使他能够与政府机构进行谈判，克服部门内部政治，以获取新冠疫情数据，并获得分析这些数据的许可。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利用他的关系网络为一位感染了新冠疫情的中国家庭成员争取到了医疗服务，这位科学家和他的中国合作临床医生将这一经验作为新冠疫情的早期成功治疗模式发表。在这两个案例中，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并不一定认识决策者本人，但他们能够通过与其他决策者关系密切的共同朋友和同事拉关系，调动“弱关系”。

关系是信任的基础

中美的科学家都认为共同的研究目标和信任是最重要的合作动机，并称他们在新冠

疫情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合作者或与他们共事过。在非危机时期，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在正式场合与中国同事建立了关系，他们可能曾经是同学、同事、共同的指导老师或在会议上见过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有助于科学家之间的“关系网”不断扩大，研究人员通过多次合作，从彼此不断加深的学术兴趣和专业知识中进一步获益。鉴于新冠疫情相关研究的高度政治化和紧迫性，以及国际旅行的限制，科学家们在自己信任的关系网络中寻找机会是合情合理的。作为一种信任形式，“关系网”对中美两国的华裔科学家在高度审查的研究环境中游刃有余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关系”的局限性

大多数科学家都目睹了地缘政治气候对科学的影响。各种“让政治远离科学”的说法不绝于耳。除了他们眼前的项目，一些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还向我们谈到了限制与华裔科学家的关系，或与他们断绝关系，失去美国政府的资助，或被他们的大学调查和处分。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也谈到了这种对工作关系的影响，他们经历了美国同事的疏远，以及由于美国大学和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对合作与交流的更多限制。所有这些都助于理解个人关系在在应对制度环境和政策方面的局限性。

我们的研究表明，以“关系”为形式的文化不仅是分析和促进中美华裔科学家之间建立联系的有用框架，也是帮助美国华裔科学家获得资源和提高生产力的工具。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尤其是在中美合作逐渐减少、中国不再过度依赖 SCI/SSCI 期刊的情况下。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察非华裔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以确定其在不同群体中的适

用性。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强调，从长远来看，有必要确保学生和学者的国际流动性，对中美之间的科学合作保持开放态度，并继续支持科学家之间建立跨境联系。正规教育和院校隶属关系是形成关系的重要基础，我们采访的许多美国科学家都报告说，他们所在院校的中国研究生或访问学者人数急剧下降。

中国学生和学者流失到其他热门目的国，不仅会对中美之间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对两国在国际上开展领先研究的能力产生长期影响。

注：本研究“了解中美新冠疫情研究合作的性质”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

德国博士学位的数量增长

芭芭拉·M·科姆

芭芭拉·M·科姆 (Barbara M. Kehm)：德国汉诺威大学 (University of Hannover) 莱布尼茨科学与社会中心 (Leibniz Center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研究员

电子邮件：bmkehm@t-online.de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于 2023 年 2 月 2 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是否正在出现博士学位大众化的趋势”的文章。这篇文章聚焦了德国近期的一则新闻，即一些应用科技大学 (Fachhochschulen) 不顾大学的强烈抗议，获得了教育和培养博士生以及授予博士学位的权利。

在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主要提供专业高等教育 (与“学术”高等教育不同)，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德国建立，主要作为传统大学的替代选择。包括教授在内的应用科技大学的教师不需要从事研究工作，但他们的教学工作量高于大学教授，并要求至少有五年学术界以外的专业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往往可以促成学校与产业界更深入的合作，并由此产生并进一步发展应用研究。近年来，德国一些州的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决定授予一些高等院校颁发博士学位的资格，要求是只要它们能证明自己是通常所说的“研究密集型”大学，至少在某些专业或院系是如此。应用科技大学必须提交各自的研究报告。然后由一个独立机构对其进行评估，并就是否授予博士学位提出相关建议。

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德国博士学位的数量增长至少还受到另外两个因素的影响，而且是从传统上已经很高的产出水平开始的。

博士学位是教席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德国博士生的毕业率一直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每个教授席位的基础设施中至少包括一个，有时甚至两个或更多的博士职位。在德国高等教育中，博士候选人并不被称为学生，而是被称为博士候选人或早期职业研究者，因为多数 (约 60%) 人拥有与教授席位相关联的初级学术职位。此外，大多数外部资助的研究项目通常包括一个或多个博士职位以开展实际研究。因此，成功吸引研究资金的教授有额外的博士候选人职位。此外，至少有 10 个大型基金会和德国研究协会 (German Research Association) 提供个人博士奖学金或为研究生院提供 5 至 12 个博士奖学金 (占博士生资助的另外 20% 至 25%)。

博士学位作为“卓越计划”中的一部分

德国“卓越计划” (2005~2019 年) 是促进德国博士学位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前两轮 (2005~2012 年) 和第三轮 (2012~2017 年) 中，共有 85 所研究生院成立并获得资助。在前两轮资助中，每年资助 100 万欧元，为期五年；在第三轮资助中，每年资助 100 万至 250 万欧元，为期五年。此外，还有一个资助过渡阶段 (2017~2019 年)。每所研究生院都为 6 至 12 名或 6 至 15 名博士生提供奖学金，其中大多数人在 3 至 5 年内顺利完成博士学位。从德国联邦统计局的

统计数据中可以详细了解德国高等院校博士学位的增长情况。自 2000 年以来，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在 2.5 万至 2.6 万个之间。2015 年，“卓越计划”资助的研究生院对博士学位数量增长产生了最大影响，当年颁发的博士学位接近 3 万个（29,218 个）。

应用科技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文章中强调的第三个因素，即应用科技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并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导致德国博士学位进一步大幅增长的。必须牢记的是，只有德国部分州允许应用科技大学授予博士学位，而且这一权利并非授予整个院校，而只是授予其少数研究密集型院系。授予博士学位的权利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才会授予，而且是临时性的。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独立机构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延长博士学位授予权。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年度统计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所大学在 2021 年授予了一个博士学位。

不过，在此还应指出另一项发展。自 2010 年起，德国各州相继建立了所谓的合作博士教育和培训程序。在合作培养博士的框架内，大学教授和应用科技大学的教授密切合作，指导和监督高等院校的毕业生。而在此之前，应用科技大学毕业生在从高校毕业后，如果没有在大学进行额外的课程学习，甚至不能开始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在这种安排下，最终由大学授予学位。德国校长会议每三年会进行一次有代表性的调查，收集有关合作博士的数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合作博士的数量从 1997~1999 年的 109 个持续上升到 2015~2017 年的 1575 个。然而，鉴于德国

高校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在 2.5 万至近 3 万个之间，这一数字无法解释德国高等教育中博士数量的增长。与此同时，非大学的基础研究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s）也在争夺博士学位的授予权，它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培训甚至比大学的还要好。将来，他们的要求可能会获得批准，从而进一步削弱大学对博士学位授予的垄断。

结语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主要结论。首先，德国博士数量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由“卓越计划”带来的，尽管我们应该记住，在“卓越计划”启动之前，德国的博士毕业率已经相对较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数字上看，应用科技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其次，尽管遭到反对，但德国大学独占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传统垄断地位正在慢慢削弱。但我们可以假定，这种侵蚀还将继续，因为德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普遍认为，应该有多种获得博士学位的途径。

如果我们可以说德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博士教育“大众化”，那么其结果就是博士学位类型的多样化，例如研究型博士、专业型博士、论文型博士、合作型博士、工科博士等等。正如大众化经常发生的那样，有必要对现有的选择进行结构性调整，或者通过纵向分层（根据声誉和排名），或者通过横向多样化（根据学位类型）。尽管德国的“卓越计划”首次尝试了纵向分层，但德国的传统仍然倾向于按学位类型和院校类型进行横向多样化。

传统黑人大学对美国具有重要价值

詹姆斯·V·科赫、奥马里·H·斯温顿

詹姆斯·V·科赫(James V. Koch): 美国奥多明尼恩大学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经济学荣誉教授、名誉校长

电子邮件: jkoch@odu.edu

奥马里·H·斯温顿 (Omari H. Swinton): 美国霍华德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经济系主任、教授

电子邮件: oswinton@howard.edu

HBCU 是在美国拥有 4730 万黑人的社区中家喻户晓的字母, 它是“传统黑人大学”(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的缩写。美国全国共有 100 多所此类大学, 目前在校学生约 28 万人。对有些人来说, 这样的院校组合可能显得不寻常, 但以种族和民族为重点的大学在国际上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它们存在于许多国家, 为穆斯林、犹太人、库尔德人和乌兹别克人等不同群体服务。

不仅非黑人美国人对传统黑人大学的存在、目的和成就知之甚少, 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对其也即无所知。《重要与珍贵》(Vital and Valuab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这本书旨在解决这一知识赤字问题。该书提供了从包括 60 多所传统黑人大学在内的 700 多所美国高校中精心收集的实证数据。它将传统黑人大学的状况和表现与其他类型的大学 (例如, 州立旗舰大学) 进行比较, 这样可以将传统黑人大学的表现置于上下文中来分析。这是迄今为止首次进行的对传统黑人大学的全面实证分析。

一点历史

美国内战之前, 美国的黑人大学就已出

现。当时的情况是, 美国黑人要么沦为奴隶, 要么即使获得自由, 也只能进入少数几所大学。南北战争后, 美国南方许多州采取了应对措施, 建立了按种族严格隔离的黑人院校。1896 年, 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判决, 对这种安排给予了肯定, 指出提供“分开但平等”的设施和服务是可以接受的。直到 1965 年, 美国政府才将传统黑人大学视为一类独立的院校。

传统黑人大学的人才输送管道

传统黑人大学因培养了众多著名且成功的毕业生而闻名, 毕业生中既有马丁·路德·金牧师 (Martin Luther King, 莫豪斯学院), 也有奥普拉·温弗瑞 (Oprah Winfrey, 田纳西州立大学)。在所有黑人医生、大学教授和军官中, 约有四分之三毕业于传统黑人大学。它们提供并维持着对黑人社区和整个美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的人才渠道。

有些人批评传统黑人大学没有让更多的学生毕业。然而, 该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表明, 这一结论反映了使用了不恰当的衡量标准。一旦考虑到传统黑人大学的学生在家庭和学术背景方面的差异, 我们就会发现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黑人大学学生的毕业率要高

于具有代表性的非黑人大学的学生毕业率。试想一下，一个未来的学生来自一个年收入 3 万美元的家庭，SAT 分数为 950 分。什么样的学校最有可能为这名学生提供能够让他们顺利毕业的环境和支持？答案是传统黑人大学。一旦考虑到家庭收入和 SAT 分数，我们就会发现，这名学生从一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黑人大学毕业的概率要高于从一所具有可比性的非黑人大学毕业的概率。

提供向上的经济流动性

传统黑人大学在提高学生经济地位方面表现出色。实事求是地说，这包括将学生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提升到收入最高的第四或第五个五分之一。以佛罗里达农工大学（Florida A&M University）为例，这是一所传统黑人大学。在二十一世纪初，39.8% 的学生来自收入处于美国最低的五分之二的家庭。然而，在平均 15 年的时间内，这些学生中有 47.6% 的收入达到了最高的五分之一。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一变化发生在一个经济和社会日益分层的社会中。

传统黑人大学正变得更加多元化

大约 78% 就读于传统黑人大学的学生自称是黑人。然而，在过去十年中，西班牙裔和亚裔背景的学生在传统黑人大学就读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拉迪加学院（Talladega College）和得克萨斯州的普拉瑞景农工大学（Prairie View A&M University）等传统黑人大学，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是西班牙裔。此外，一些传统黑人大学，如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摩根州立大学（Morgan State University）和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都招收了大量国际学生，他

们非常喜欢这些院校的国际化氛围。

传统黑人大学“值得一去”

传统黑人大学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远不止于毕业和流动。传统黑人大学是其所在社区的社会和经济支柱，其举办的活动（如橄榄球赛）有时会吸引 5 万或更多的观众。

从历史上看，传统黑人大学往往是美国黑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机会。现在情况可能依然如此。在美国著名大学就读的黑人学生比例通常低得令人担忧，如：在科罗拉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只有 2%，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Ann Arbor）只有 4%，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只有 5%。非传统黑人大学为美国黑人学生敞开了扇机会之门，但进展并不十分明显。

挑战

有几项挑战将影响传统黑人大学的未来。其中之一就是许多人现在所说的即将到来的“入学悬崖”，美国高中毕业生的绝对人数将从 2026 年开始下降，并将持续十多年。这将加剧本已严峻的高等教育入学形势：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连续 11 年下降。这种人口结构上的挑战可能会迫使农村地区一些规模较小、由私人支持的传统黑人大学关门。这将构成不可逆转的变化。由于没有人指望会有新的传统黑人大学诞生，传统黑人大学的消亡就好比失去了一种濒危物种。一旦消失，它将永远消失。

传统黑人大学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它们通常在行政职能上的支出水平过高。许多传统黑人大学的行政工作头重脚轻，这减少了它们能够用于教学和研究等其他重要职能的资金。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

一个现实，即传统黑人大学作为一个群体，规模效益。
其规模小于非黑人院校，因此无法像规模较
大的非传统黑人大学那样享受管理上的经济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副主编：王琪
编辑：吴燕
翻译：陈若曦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4458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ociate Editor: Qi Wang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Translator: Ruoxi Chen
Address: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4458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